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學常識

曹

撰著

041

273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615174



④ 041 / 47.3

030
55023
36

國
學
常
識

曹 樸 著



文 光 書 店 印 行

國學常識

印翻不准★權作著有

定價國幣

元正

著者曹

發行人陸

夢

樸生

發行所文

光書

店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三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滬）初版

241
1173

編例

一、本書以供中等學校學生課外閱讀爲主要目的，亦可供一般對國學開始發生興趣者之參考。

二、本書所搜輯之材料，均屬於常識範圍，不涉專門事項，卽一般國學常識書中過於瑣碎之人名（例如明代文人有前七子，後七子、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等名目，所包含之人名甚多，本書僅提到前後七子的代表人物，其餘均從略）術語（例如沈約所倡詩忌八病的解釋，僅舉八個名稱，並不能明白其實在意義，不如索性不講）等，亦一概從略。

三、本書對於學術源流及派別，對於各時代思潮的起伏變動及其背景，均加簡明的解釋，並不憚前後反復申說，以期讀者獲得貫通的理解。

四、本書對於國學各方面在目前的發展趨勢，亦略加敘述，使讀者不致墮入抱

殘守關的固陋之見。

五、本書引用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馮友蘭、胡適之諸先生的言論較多，間亦附以鄙見，不過取捨贊否之間，既非人云亦云，亦不標新立異，唯一的主旨是在使讀者能從各大家意見觀其會通，而不宥於冬烘學究舊套。

六、本書雖不注重瑣碎的常識，但一般國學常識書中之比較重要的事項，仍儘可能容納（例如「建安七子」「竟陵八友」……的姓名），故於畢業會考或大學入學考試前參考，仍甚適宜。

七、本書參考坊間出版之同類書籍與期刊，儘可能的集合各方特點，提要鉤玄，於短小篇幅之中，具有多數書刊的縮影。讀者手此一編，即無異於與各種中國哲學史、文學史、史學史、文化史著作相接觸。

八、本書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節，卷首載有詳細目錄，頗便於參考。但仍有重要事項或人名書名，為目錄上所不及載，或散見各處而不易查閱者，另

之前。第七八九章爲哲學部分，先諸子，次佛學，再次理學，係按時代次序排列，使讀者容易看出演變的跡象。第十至十二章爲文學部分，因詩歌是最早發生的純文藝，故首說詩、騷、賦、詞、散曲等屬於詩歌一類的作品，而後說到散文與駢文。至於小說、戲曲及民間俗文學，因其發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視，所以放在末了。最後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學及藝術，以表示我們對於這些學術的重視。

十一、我國文人每有幾個名字，本書所用以一般人熟悉者爲主，有時稱名，有時稱號，沒有一定，但爲免除讀者誤會起見，隨時將其另一通用的名字注明。

十二、本書因倉卒編成，又因限於環境，參考圖書有限，不免發生重要的遺漏與訛謬，尙望學術專家及一般讀者不吝賜予指正。

目次

第一章 概說

- 一 所謂國學……………一
- 二 國學在清代……………三
- 三 國學的分科……………六
- 四 國學的派別……………八
- 五 進步的方法與貧乏的內容……………一二
- 六 歐美學術的影響……………一四
- 七 五四以後的國故整理……………一五
- 八 國學與世界學術……………一七
- 九 專門研究與基本知識……………一九

第二章 語文

- 一〇 研究的態度及準備工作……………二一〇
- 第二章 語文……………二二一
- 一一 研讀古籍的階梯……………二二三
- 一二 所謂小學……………二四
- 一三 六書……………二五
- 一四 字形的演變……………三〇
- 一五 字義的演變……………三一
- 一六 訓詁學……………三三
- 一七 文法學的先驅及其發展……………三五
- 一八 方言學……………三七
- 一九 字音的變遷……………三八
- 二〇 語言和文字的分離……………四〇

二一	雙聲疊韻	四一
二二	反切	四三
二三	四聲	四五
二四	聲韻學	四六
二五	字母	四九
二六	韻部	五一
二七	古音之推定	五三
第二章 古物		
二八	金石之學	五六
二九	殷墟發掘	五八
三〇	甲骨之學	六〇
三一	古物與社會學	六二

三二	無文字的古物	六三
三三	古物與考證學	六六
三四	古物與古書	六七
第四章 書籍		
三五	傳寫本與刻本	六一
三六	版本之學	七五
三七	校讎之學	七六
三八	章句之學	七八
三九	目錄之學	七九
四〇	圖書分類法	八一
四一	輯佚及辨偽	八五
四二	類書及叢書	八七

四三 考證學與讀書法……………九一

第五章 經學……………九三

四四 五經、十三經、四書……………九三

四五 易經……………九五

四六 書經……………九七

四七 詩經……………九九

四八 三禮……………一〇一

四九 春秋……………一〇四

五〇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一〇五

五一 經之傳授……………一〇七

五二 今文經學與讖緯……………一一〇

五三 古今文學派的鬥爭……………一一二

第六章 史地

- 五四 漢以後的經學……………一一四
- 五五 清代的經學……………一一六
- 五六 經學的揚棄……………一一九
- 五七 所謂正史……………一二一
- 五八 正史的內容……………一二三
- 五九 編年史……………一二五
- 六〇 紀事本末……………一二六
- 六一 別史……………一二六
- 六二 政書……………一二八
- 六三 雜史傳記及其他……………一三〇
- 六四 學術史……………一三一

六五 史評……………一三二

六六 地理……………一三六

六七 歷史哲學……………一三七

六八 新史學的產生……………一三九

六九 新史學的業績……………一四一

第七章 諸子……………一四六

七〇 諸子的學術派別……………一四六

七一 儒家……………一四九

七二 道家……………一五二

七三 墨家……………一五六

七四 別墨及名家……………一五七

七五 法家……………一五九

七六 兵家及其他……………一六一

七七 王充之學……………一六四

七八 魏晉時代的玄學……………一六六

七九 子學之興起與消沉……………一六八

第八章 佛學……………一七三

八〇 初期的佛教……………一七三

八一 佛教的中國化……………一七五

八二 流傳中國諸宗派……………一七九

八三 小乘諸宗……………一八二

八四 傳自印度的大乘諸宗……………一八四

八五 中國獨創的大乘諸宗……………一八六

八六 佛學與儒學……………一八九

八七	因明學	一九二
八八	唯識論中的心理學	一九四
八九	現時佛學的趨勢	一九七
	第九章 理學	一九九
九〇	宋明理學的產生	一九九
九一	周敦頤與邵雍	二〇二
九二	張載及二程	二〇三
九三	集宋學大成的朱熹	二〇七
九四	陸象山與楊慈湖	二一一
九五	浙東學派	二一四
九六	宋末至明初之理學	二一五
九七	王陽明之學	二一六

九八 清初各大師對於理學的批判……………一一一九

九九 理學批判的最高發展……………一二二一

一〇〇 宋明理學的沒落與新理學的產生……………一二二六

第十章 詩賦詞曲……………一二一九

一〇一 文學的範圍與類別……………一二一九

一〇二 最早的詩總集……………一二三一

一〇三 楚辭……………一二三三

一〇四 賦……………一二三五

一〇五 樂府……………一二三八

一〇六 五言詩……………一二四〇

一〇七 陶淵明與南北朝詩……………一二四二

一〇八 唐詩……………一二四五

一〇九	李白杜甫	二四七
一一〇	唐以後的重要詩人	二四九
一一一	詞	二五一
一二二	重要詞人	二五三
一三三	散曲	二五五
第十一章	散文和駢文	二五七
一一四	散文和駢文的分別	二五七
一一五	散文與駢文的分合	二六〇
一一六	周秦漢的散文	二六一
一一七	六朝文	二六四
一一八	唐宋八大古文家	二六六
一一九	明清兩代的古文家	二六八

一二〇	所謂古文義法	一二七一
一二一	駢文的標準化及其支流	一二七三
一二二	八股文及對聯	一二七五
一二三	文藝論評	一二七八
一二四	文體解放和文學觀念的變動	一二八〇
	第十一章 新被重視的文學	一二八二
一二五	戲曲的搖籃期	一二八二
一二六	戲曲的成長期	一二八四
一二七	唐以前的小說	一二八八
一二八	宋元明的小說	一二八九
一二九	清代的小說	一二九二
一三〇	寶卷、彈詞、鼓詞	一二九四

一三一	中國文學與東方諸民族的相互影響	二九五
一三二	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關係	二九八
第十三章 科學及藝術		
一三三	自然科學在國學中的地位	三〇一
一三四	天文學和曆法	三〇三
一三五	數學	三〇五
一三六	物理學及化學	三〇八
一三七	醫學	三〇九
一三八	應用技術	三一—
一三九	科學與迷信	三一—
一四〇	藝術	三一—
一四一	繪畫及書法篆刻	三一—

一四二 音樂

三二〇

索引

三二五

第一章 概說

一、所謂國學

國學這個名詞發生於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誰所創造。有人說，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組織「國學講習會」，劉師培（申叔）氏也有「國學保存會」的發起，大概他們就是國學兩個字的最初使用者。這是不是正確，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國學這個名詞，是因為歐美學術輸入才發生的。它的範圍，是把西學輸入以前中國原有的全部學術包括進去的。

和國學相當的名詞，還有國粹和國故。國粹兩個字，似乎有點誇大中國學術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點選擇精粹部分而拋棄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們覺得不甚妥當，改稱國故。國故，就是本國文獻的意思。不論精粹不精粹，過

去的文獻總是可寶貴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國故範圍裏面去，這樣看起來，國故這個名詞總算是公平而完備了。但它也有它的缺點，就是只能夠代表研究的對象，而不能代表研究這種對象的學問，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國故學的名稱來代替它，最後又簡化而稱爲國學。

可是這個名稱還不是十分合理的，因爲學術沒有國界，當代各國都沒有特殊的國學，而我們所謂國學，從內容上看，也就是哲學、文學、史學等等的東西，都是可以作爲世界學術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實上外國也已經有研究我國古代文化的人了，我們爲什麼不採取世界公用的名稱，如中國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等類的名詞呢？而且對於具有種種內容的學術，爲什麼不加以各別的名稱而必須採用籠統的總名稱呢？這都是值得考慮的。

但我們爲了依從習慣，並且因爲中國各科學術還沒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學術融合爲一的緣故，只得仍舊採用國學這個名稱。

二、國學在清代

中國學術，以周秦諸子時代最爲發達，當時諸子百家，各有專長，不相勦襲。自漢代表彰六經，儒家定於一尊，諸子之學衰落，而經學成爲唯一的學術。兩千年來，除解釋經書外無學問。但到了清朝，似乎從解經之中有開闢一條新路的趨勢。過去漢儒解經，注重字句的解釋和制度的考證，但宋儒反對漢儒的方法，主張依經義而修養心性。清初學者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諸儒無補時艱。於是起而批評宋明心性之學的流弊，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然而他們所謂實學，仍然以通經致用爲中心，因此便是非常留心當世之務的顧亭林，也不敢稍爲懈怠他的經學研究，並由經學而奠定了清代考證學的初基。顏習齋(元)李恕谷(璩)繼起，提倡實踐，反對空言，無論性理考據，都在排擊之列，但由於他們要實行三代政治，最後也不得不歸於考古。其後戴東原(震)出來，一方面以新理學姿態批評宋明思想，一方面繼承顧亭林的考證學而加以發展。同時惠定宇(棟)亦

標榜漢學。惠戴以後，繼起有人，考證學派於是佔了學術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統的考證學派繼承東漢經師爲學而學的精神，埋頭研究，不談現實政治，到道光咸豐以後，內憂外患交逼而來，不容許士大夫的脫離現實，於是正統漢學又逐漸衰落了。代之而興的於是有繼承西漢學者經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學派。公羊學派中的康（有爲）梁（啓超），最後亦不嚴格地遵守西漢經說，而直接以己意解釋孔孟，以作維新運動的根據，清代思想如再進一步，就有解脫孔孟束縛的可能。本來正統派中著名的學者如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以及最後的章炳麟，都是對孔孟以外的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們開始的時候只是「以子證經」，拿子學做經學的工具，其結果便使擱置了幾千年的諸子學說也爲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譚嗣同，更主張「衝決一切網羅」（見「仁學」）。這種發展的趨勢，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顯然的。因此梁啓超氏曾說清代很像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但是有一個問題。歐洲的文藝復興，是研究希臘羅馬的古學，解放中世紀的思想镣铐，其結

果引起了近代科學的勃興；中國的文藝復興，是闡揚周秦時代的古學，解放秦漢以來儒家思想的束縛，其結果應當也引起科學的發達，可是我國的科學爲什麼沒有發達起來呢？這是滿清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反動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說，清代考證學派本來是因糾正性理學派的缺點而起，性理學派的缺點是空疏而不切實用，考證學派以客觀態度研究經書，就解經而言，誠然不空疏，但是流於瑣碎支離，解經也終於不得要領，至於國計民生之現實問題，更是他們所不了解的，他們學問的不切實用，仍然同性理學派一樣。晚清諸學者因爲受了列強內侵的刺激，及外來思想的影響，大家對於現實問題有所主張，如康有爲的倡導維新，章炳麟的參加革命，他們各自代表考證學派的一分支，作爲二千年來經學的光榮的殿軍者。辛亥革命以後，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學者的眼裏，已經回復到與諸子同等的地位，國學不應當再以解釋經書爲唯一任務，已是當然之理，而自己創立的學說，尤其不必假託古人的招牌來傳布，也是無庸多說的。

不過前代學術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們借鏡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們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們利用，所以我們不能忽視。

三、國學的分科

中國學術向來無所謂分科的，一般儒者都是以萬能博士自命，他們常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所以那些學者的全集裏面，也有詩詞歌賦的文學作品，也有評論史事的論文，也有代聖賢立言的經書註疏，可說對整個學術範圍內的各方面都有所貢獻。但就個人的材性用力的淺深說，本來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學人仍然只能以一種專長著名，如朱熹以理學著名，李白以詩著名，人們決不會指朱熹為詩人，指李白為理學家。所以事實上，國學仍然是分了部門的。

曾國藩把學術分成「義理」（即性理之學或理學）「考據」（即考證學）「

詞章」三大部門，（戴東原亦曾如是分類），他寫給他弟弟的信說：「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

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在這個指導讀書方法的信中，我們看到他們怎樣說明三大部門的學術，怎樣主張選科，並且指出在義理一門之下，還可以按照經書的種類及史書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過三大部門的研究對象，都是經史，整個學術範圍，非常狹小。諸子百家，只當作參考書，全部學術集中在儒家一派的範圍以內。三大部門的重要性，是義理第一，詞章第二，考據最末了，他的話完全是宋明以來儒家正統派的傳統意見。

義理之學，照理應該還有老學、墨學……等等的專科，但因儒家的獨佔，就

沒有它們的份兒了。

詞章之學，包括詩及古文兩個主要部門，其次有賦、詞、曲、駢文等。現代文學所尊重的小說及戲曲，過去不被重視。

考據之學，除按照經書的種類分科外，又按照問題性質而分科，如專門攷名物制度的狹義的「考證學」及專門考文字訓詁的「小學」以及專門考書籍源流真偽的「校讎學」，是三大科別，此外還分出許多獨立的部門，如小學內分出聲韻學，訓詁學，以及金石學甲骨學等，校讎學又分成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等。

四、國學的派別

講實證的學術，分科繁而派別少，尙玄思的學術則相反。國學以古書爲對象，文字艱深古奧，又不免有遺漏和錯誤，後世的人無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來質疑，就只好憑自己的意思來解釋，因解釋的不同，而派別便產生了。以前說的「義理」「考據」「詞章」的三種學術，雖然是三個部門，但同時也是三個派別，因

爲學者所採取的道路不同，對於同一古書的解釋會得到相異的結果。所以曾國藩說他們「各執一途，互相詆毀」。

在考據學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謂桐城派詞章之學也抬頭起來。桐城派文人以「載道之文」相標榜而譏誚考據學的支離破碎，無補於聖道。考據學者則譏誚桐城派文章沒有內容，根本無所謂「道」。考據學者批評義理之學的空疏，可是義理學派也譏誚他們的破碎支離。這幾派之中，考據派在學術界雖然稱霸，但清政府所獎勵的却以義理之學爲主。

義理學派即所謂宋明道學，因其解釋經書遇着難解之處，不去找許多古書參證，考查原來的意義，只是「望文生義」，照字面去講，所以人們說它空疏。其實這個學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義，不是完全不注意古書的遺漏錯誤，我們一看四書的朱註便知。這個學派的特點，是在於借孔孟的話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朱熹（晦菴）的四書註，就是宣傳他的理氣二元論。陸九淵（象山）更公然說「

六經皆我註脚」。的確，他們表面上是註解經書，實際上是拿經書註解自己。可是朱熹還不敢公然這樣講，他的意思只是說，按之人情物理，孔孟的這些話應當這樣解才對。朱氏是主張『格物致知』的，這就是從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為這一點，使朱陸又分成兩派。朱氏的學術，淵源於程頤（伊川），所以這派叫程朱派。陸象山之學，到明朝王守仁（陽明）而有澈底的發展，所以這派叫陸王派。程朱之學，講求窮理盡性，稱為理學。陸王也講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觀性，而陸王的理是純主觀的，陸氏說「心即理」，所以人們為與程朱的理學分別起見，又叫陸王之學為「心學」。

義理之學大致和現代所謂哲學相同，所以有派別，無分科。考據之學和現代所倡社會科學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別。可是因為研究的對象不是社會而是古書，所以考據之學的派別，不是從理論上分的，而是從古書的傳授系統上面分的。漢朝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來提倡經書的研究，許多儒生都用當時通行的隸

書寫着經書進獻，據說是因爲古經原本已不容易覓取，他們這些儒生都是憑着口耳相傳的方法，一代一代的傳授下來的。後來却有人貢獻古本經書了，那些書據說是藏在什麼古建築物（如孔子故宅）的夾壁中間，或者什麼山岩裏面，被人家發現出來的。有了這一套古字的原本，於是就有一班儒生來研究它。由於這種版本和前面那種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於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實兩者的分別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內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別是思想方法方面（這點後面再說）。這兩派經學家所做的事，或係考證古書的真偽，或係考證古書上的名詞器物 and 制度，或係探討古代文字的意義，或係探討經書的徵言大義，所以一般稱爲考據之學，因爲考據之學創於漢朝，又稱漢學，而和漢學相對的義理之學，因爲創於宋朝，就叫宋學。

在詞章之學方面，古文和駢文不但是兩個門類，同時又是兩個派別的名稱。

駢文是四六對偶的文體，古文（這個古文和經學上的古文，名同而實異）是不要

對仗的散文，研究駢文的就反對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對駢文，因而形成兩大派別。清朝除這兩大派對立外，古文派內部又有桐城派和陽湖派的分別。

五、進步的方法與貧乏的內容

考證學派所用的方法是歐洲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我們從考證學大師戴東原的治學方法可以證明。梁啓超曾舉出它的十大特點，大意如左：

- (一) 凡建立一個主張，必須依靠證據。
- (二) 選擇證據，以時代為標準，時代越古的證據，就越認為可靠。
- (三) 孤單的證據不能建立確定的結論；其無反證者暫時保存之，得有續證則漸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拋棄之。
- (四) 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都認為不道德。
- (五) 最喜歡集合許多同類的事項，作比較的研究，而探尋其一般的規律。
- (六) 採用舊的學說，必須明顯地引用，反對暗中偷用。

(七)彼此見解不同，儘量發展論爭，弟子也可以駁難本師，被批評者並不生氣。

(八)論爭以本問題爲範圍，採客觀的理智的態度，對於對方意見亦同樣尊重，反對謾罵譏諷及牽涉題外。

(九)喜歡專門研究一個問題，作深入的探討。

(十)文體主張樸實簡潔，反對囉囉嗦嗦。

以上這種方法，顯然是西洋所謂實證主義的具體應用。胡適也曾經說過清代考據之學的特點有兩個：(一)大胆的假設；(二)小心的求證。這兩者就是科學方法的要點。

清代學者所用的方法雖然是進步的，但所研究的對象非常狹隘，所獲得的成果非常微末——雖然有極可寶貴的收穫，但就多數學者所耗費的精力而比例地說，那成果是相對地小。除天文學及算學外，廣大的自然科學領域完全不被清代學

者涉及。即就古學而論，所謂名物制度的考證是很少輝煌的成績的。最大的收穫只是在文字訓詁方面。當時以考證著名的有戴東原及惠棟兩派，戴派比較地富於批評精神，研究的成績就比較多，文字訓詁方面的收穫是他們的功勞，惠棟派拘守漢儒傳統，缺乏批評精神，其考證支離瑣碎，不得要領。

六、歐美學術的影響

歐洲自然科學的輸入不自清末始，在明朝就開始了。從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到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之百餘年間，西洋教士來到中國的有七十人，著書二百七十種，除關於宗教者外，還有關於數學、天文學、地理學、農學、論理學等科的。中國曆法，因受這個影響而有所改革。經學家因受這個影響而將天算之學納入經學的範圍，他們認為，經書裏面有說及天象及曆法之處，研究天算專門之學，正是通經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當時考證學大師戴東原，對於天文及數學，有相當的造詣。因此，考證學派之採用科學方法以研究經學，也

不能不說是受了西學輸入的影響。這個影響如果擴大，各種自然科學都有從經學裏面逐漸生長出來的可能。例如從「禹貢」的研究，已發生了地理學的一部分（沿革地理），從「毛詩」草木蟲魚的研究，可以發生動植物學。但因為當時社會經濟沒有新的發展，政治方面又為雍正帝的高壓政策及乾隆帝的懷柔政策所籠罩，加之，羅馬教皇禁止中國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項舊的習俗，大為中國士大夫所不滿，以致歐洲來華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為之中斷，所以西學影響，僅達到古書研究方法上的革新為止。

七、五四以後的國故整理

傳統的經學，到了康有為，已經發展到了頂點，正統的考證學派（即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過此以後，人們都採用新工具新材料來研究中國古文化了。

完全採用新觀點來整理國故，是從「五四」以後開始的。「五四」以後與「五

四」以前的異點，在於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對於流俗之見雖然敢於批評，終於不敢澈底推翻傳統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傳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則始終不肯踰越漢代古文經學家的範圍（他談文字學，以許氏「說文」爲絕對可靠，反對旁人根據甲骨文鐘鼎文以批評許氏之說）。五四以後，胡適梁啓超顧頡剛諸氏的整理國故，是沒有絲毫偶像觀念的。胡適曾說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學術的思想，採取評判的態度，分開來說，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他解釋第三點說，整理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說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以上所引，均見「新思

潮的意義」一文。這一點尤其足以區別今人與前人研究國學的精神。現在一般學者都有歷史進化的眼光，所以再沒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義者，也不因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謾罵他。「新青年雜誌」及「吳虞文錄」上面的評孔文章，雖然不免缺乏歷史觀念（因為它們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會背景），但是它們的主旨在於反對不合現代生活的傳統思想，並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歷史上的價值。自顧頡剛著「古史辨」以來，許多學者應用社會進化史的理論來整理中國古代史，考古學方面，也有若干創獲，整理國故的工作在社會學幫助之下更開闢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學者支離破碎的毛病是決不會再犯的了。

八、國學與世界學術

我曾說過，國學非中國人所能私有，它應當是世界學術的一部分。這點在外國人眼中，早已不成問題，如他們將我們重要經典翻譯過去，對於我們近年研究國故的著作也很注意，擇尤翻譯，而且他們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專家，咬着牙讀

我們佶屈聱牙的古書，或者不遠萬里而來，發掘我們地底下的古物而帶回他們的博物館與圖書館去，他們又不斷的考證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著爲文章與專書發表出來。另一方面，我國有見識的學者也早已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採用世界學術上的新方法新工具來研究國學，並且也利用外國的材料，例如研究聲韻學，則採用A B C D之類的音標以代替舊有的「見溪羣疑……」那一套工具，參考耶費孫，高本漢那些外國人的著作，並且也採取那些外國人以西藏語蒙古語緬甸語等東方語言與漢語比較研究的方法；又如研究程朱的理學，而與西洋的亞里士多得，黑格爾哲學相比較，研究我國解釋易經的象數之學而與希臘畢達哥拉斯學說相比較；（以及應用技術方面，拿新醫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整理國醫，研究國產藥材；應用會計學、簿記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改良中式簿記等項）：都可以說是有世界的眼光，沒有故步自封，抱殘守缺的陋儒習氣。

然而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坐井觀天的人，機械地把國學和西學或科學對立起

來，以爲研究國學就可以不讀外國書，甚至可以不要科學知識，那實在太可笑了！

不待說，現在國學和世界一般學術還是沒有打成一片，浩如烟海的四庫典籍，只是一堆雜亂混合的歷史材料，亟待我們整理，我們固有的農、工、商、醫等等應用技術儘有其特長之點，亟待我們的科學工作者自己加以發掘。凡此種種，都是我們對於本國學術的應盡之責，但必須了解國學在世界學術中的地位，才能有正確的研究方向。

九、專門研究與基本知識

整理國故是專門研究的工作，必須分工進行，例如研究哲學的就整理哲學方面的材料，研究文學的就整理文學方面的材料，而且在哲學或文學裏面，還可以作進一步的專門研究，如專門研究一派的學說，或一個時期的作品。

進行專門的研究必須具備前提條件：一點是在現代一般學術中早已選定了專

攻的部門，而且有了相當的了解；一點是對於國學的各方面先有一個大致的認識。

不但整理國故者先須有一個對於國故的大致認識，而且連不去整理國故的一般知識分子，也須有一點關於國故的基本認識。爲什麼呢？因爲一個中國人，對於中國的固有文化，應該知道一個大概，才可以免掉「數典忘祖」的譏誚，這是一；尤其是因爲過去的歷史，對於眼前的生活有密切的關連，不懂得過去就不能理解現在，這是二。

十、研究的態度及準備工作

初步研究國學，不能作局部的精深研究，而應當涉獵各方面，作一全盤的鳥瞰。研究國學也不可與研究國文混同，研究國文是研究閱讀及寫作本國文字的技巧，只可以拿小部分的古人文字做參考，不必涉及其他的方面。研究國學的基本知識，可以涉及各方面，但也不必耗費過多的時間去讀古書，只須把最重要的幾

種瀏覽一下或大致翻閱就很夠了，有的人以爲研究國學就是學做古文或駢文，那當然更錯。王國維有云：『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史序）如果知道前代的文學爲後世所莫能繼，就不必勉強的鑄造假古董。我們大可以參考前代之文而另自創造我們這一代的文學。至於說能作古雅駢儷之文，就可以作高級的應酬文字，爲干祿的工具，那又更把學術的地位看低了。

另有一些重視國學而頭腦冬烘的人，就不免拘守通經致用的古話，以爲當今之世，還是只要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這是宋朝趙普的話），甚至於想考訂「周禮」，行之今日。這種思想當然也不合現實需要，不是我們所應保留的。

我們尊重先民的文化遺產，同時了解它的歷史意義，凡可以供現代採用的當然繼續發揚，而不合現代需要的則不必勉強繼續，只須知道它在過去一定時期中的重要性，就行了。

本書的討論限於常識的範圍，不是深入地研究，更不是講整理工作，只是關於國學的初步概念提示。

可是即以初步的嘗試而論，也得做做兩種準備的工作。首先要讀一讀關於文學、哲學、史學、社會學的基本書籍，例如哲學大綱，文學概論之類，使自己對於現代學術中和國學最有關係的幾個部門先有一個概念。其次是讀一讀近日出版的中國社會史，使自己對於本國文化演進的背景有一個輪廓似的認識。假使這種工作早已做過，那末巡禮一下國學的園地，便不是毫無意義了。

第二章 語文

一 研讀古籍的階梯

平常以爲能讀現代通行的文言文，就可以讀古書，那是不對的。因爲古書中有許多文字，現代已不通用，即使可識的文字，其所代表的古代語言，也不是我們所能一見瞭然的。加之古書經過數千年的輾轉抄寫或翻印，錯誤顛倒脫漏，都在所不免，不經過專門家的考訂，便無從理解。例如「老子」裏面有一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般文人將「佳兵不祥」作爲一個成語來用，意思是窮兵黷武爲不吉祥的事，其實把「老子」上原意弄錯了。清阮元序王引之「經傳釋詞」說：「佳爲佳之訛，佳同惟，老子夫惟兩字相連爲辭者甚多，若以爲佳，則當云不祥之事，不當云器」。兵是干戈等武器的總名，兵是不祥之器，文義明顯，只因惟

字誤成佳字，人們就讀不通了。至於惟字只寫半邊，古銅器銘文已有確切的證明。由此一例，可知學習古代語文是研究古代典籍的必由之路。所以戴東原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

一一一 所謂小學

研究古代語文之學，自漢以來，稱爲小學。許慎「說文解字敘」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即是識字的課程，保氏是小學的老師，國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周禮」所說，是周朝貴族子弟的教育制度，漢朝却用小學來代表其中的一種課程——六書，可說是名詞的濫用。漢以後所謂小學的內容，和周時小學中的「六書」課程也不相同，周朝的六書課程只是教兒童認識當時通行的文字，漢以後的小學却是考究文字的源流，是專家學者的事業，不是小學生的功課。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開列各種書目，內小學一類的書，如「蒼頡」，「凡將」，「急就」，「別字」等，都是「包舉雜字」，或字典性質的書，自此以後，凡屬解釋文字的書，都稱小學。清代修四庫全書，將小學類分爲訓詁之屬，字書之屬，韻書之屬三種。小學類的書，列在經部書籍的末了，因爲過去學者以經學爲中心，認爲小學不過是讀經的工具。

現代學者對於這門學問，已經正名爲文字學與語言學。並且不把它附屬在經學裏面，因爲古代語文的研究，對於社會學，史學及古代各派哲學（諸子）的探討都有關係，不僅和六經有關。

一三 六書

六書是造字及用字的方式，其名稱與次序，有幾種講法。漢劉歆及班固的講法是（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許慎的講法是（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

注，（六）假借。一般文字學家多採用許氏的名稱，但次序以劉班兩氏所定者爲比較合理。現在依劉班次序及許氏的名稱與定義略加解釋。

象形——許氏說：「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日字篆文作圓形象太陽，內一畫係象日中的斑點。月字篆文象缺月之形。除日月外，如山、水、牛、羊、魚、鳥、米、禾、門、戶、子、女、君、臣、手、足、耳、目等，都是象形，看篆文即可明白。

指事——許氏說：「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上下的意思是抽象的，沒有一定的形可以畫，於是畫一橫線作標準，再在橫線的上面或下面作一符號來表示之。篆文上這符號就是一較短的橫線，或作直線。其他例子如「中」，以□象四方，以——爲表示中央的符號。如「一」「二」「三」，以橫線表示數目。如「刃」，在刀口作一記號。如「本」，在木的下部作一符號，表示根部；「末」，在木的上部作一符號，表示樹梢；「朱」，篆形爲米，在木的中部作一符

號，表示木的中心。

會意——許氏說：「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武信是也。」會意是合兩三字爲一字，合舊字的意義以形成新意義。例如止戈爲戢（武），就是合止戈兩字的意義，來表示「武」乃是制止戰爭的行爲。人言爲信，就是合人言兩字的意義，來表示「信」乃是人類說話的道德。其餘的例子如「祭」由「又」「肉」「示」（古祇字）三字合成，即以手（又字即手字）持肉祭神之意；如「苗」有草生於田之意；如「炙」有以火燒肉之意；如「絞」有繩索相交之意。

形聲——許氏說：「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聲字是由形符與聲符兩部分合成的，如「江」「河」兩字，水旁是形符，「工」「可」是聲符，形符是表示這類事物的總名的，所謂「以事爲名」就是關於形符的說明。聲符是表示這一事物的語音的，即用聲音相同或相似的固有之字來擔任，所謂「取譬相成」就是用別的同音字來比譬，以構成此一新字的意思。形聲字在漢字中極多，

「說文」九千三百餘字中，形聲佔七千六百九十；宋鄭樵「六書略」中，計 21341 字。形符與聲符的配合，有左形右聲的，如「江」「河」；有右形左聲的，如「鳩」「鴿」；有上形下聲的如「婆」「娑」；有外形內聲的，如「園」「圃」；有內形外聲的，如「聞」「問」。

轉注——許氏說：「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這是字義上的現象，與字的形體無關。轉注就是互訓，凡意義相同的字，彼此可以互相訓釋，就叫轉注，所以說「同意相受」。建類之「類」就是聲類，一首之「首」就是語根，「建類一首」就是立一聲類以爲語根，其後雖輾轉變化，而語根的聲母與韻母，或者能夠完全保存或者保存一部分。這就是說，凡轉注字，聲音相同或相近，而意義又能互相訓釋。按許氏所舉的老考兩字，韻部相同，意義也相同。其他的同義字，如謀謨同屬齒唇音，顛頂同屬舌頭音，稟程同屬後聘音，都是聲母相同的。

假借——許氏說：「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這也是字義上的現

象，與字的形體無關。轉注是一個意義而有幾個字，假借是一個字而有幾個意義。假借字的發生，是由於語言中發生了新語彙，而沒有和它相當的文字，所以說「本無其字」；於是借用同音的舊字來代表它，所以說「依聲託事」。而就文字方面說，是在舊字上賦予新的意義。因此凡字有許多意義，除本義外，都屬於假借義。「令」的本義是「發號」，「長」的本義是「久遠」，而用來表示縣官，如縣令，縣長，則是假借。又如「來」的本義是一種麥子，假借為來往之來；「烏」的本義是一種鳥，假借為烏呼之鳥；「能」是一種熊屬的動物，假借為能力之能；這些字中間，有許多自假借義通行，本義就漸漸不用。此外還有一種「通假」，就是「本有其字，倉卒記不起來，乃借用音同或形似的字來代替」例如「氣」字本義是「饋客芻米」，即糜餼之餼本字，後世假借「氣」來表示氣體，其實表示氣體本有一個「气」字。又如前後之「前」，本字是「𠄎」，剪刀的「剪」本字是「前」，現在假借表示剪刀的字來表示前後，而另造一「剪」字表示剪刀。這

種假借就是現在所謂寫別字。

一四 字形的演變

中國古代的文字，現已確實知道的，以甲骨文爲最古，係一八八九年在河南安陽縣境殷墟舊址發現的，刻在龜甲獸骨上面，字形極不確定，一個字可以寫成很多樣子，象形字佔絕大多數。其次是鐘鼎文，就是殷周銅器上面所刻的銘文。還有石鼓文，是唐朝初年在陝西掘獲石鼓時發現的，那字體是籀文，大約是秦朝初年的石刻。在籀文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鐘鼎文，通稱爲古文（但近來甲骨學者證明籀文卽古文）。籀文則一般稱爲大篆，據古人傳說，是周宣王時太史籀就當時文字整理出來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首倡規定秦文爲標準文字，禁止使用其他字體，於是參照大篆字體，再加以簡單化，而作小篆。同時又根據當時流行的俗體文字，創造一種更簡單的隸書，供徒隸之用。篆書係當時正式文字，保存古文原意的地方較多，隸書係俗寫體，只求簡便，對六書本意多不顧及。但

因其便於使用，以後便流行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隸書以後，還有八分書，楷書，字體變更之處很微小。隸書在秦時很簡單，但漢朝因須使用於隆重的文書，要寫得美觀些，又把它變得難寫一些了。八分書就是因救濟漢隸的煩難而產生，它就是隸書的別體。楷書產生於漢魏之間，是從隸書稍加變化而來，鍾繇王羲之是書寫楷書的名家。與楷書並行的還有「行」「草」二體，都產生於漢朝，因其筆畫草率，只用在隨意的書寫上，沒有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正式文字的地位，自後漢至今一千六百餘年，始終被楷書所佔有。

關於字形演變的趨勢，大致是由象形而象聲（甲骨文象形字佔大多數，說文中象形字佔十分之二，現在四五萬字中，象形字不過百分之四左右，其餘形聲假借，都是象聲的字），由繁而簡，這本是文字進化的一般規律。但是守舊的文字學家對於隸書的破壞象形遺制，很不贊成，因為從隸書通行以後，古代小學生所能認識的篆書或古文，到現在雖專家都不能完全認識了。

一五 字義的演變

六書中的轉注假借就是說明字義演變的。因為假借字的發展，許多字的本義逐漸被人們忘記，而後人對於古義就不明白了。因為方言的紛歧，同一意義而產生不同的字，若是沒有人蒐集起來，互相注釋，人們也會不能了解。例如「后」的古義是君主，現在却是指君主的妻；「止」的古義是「足趾」，後來引申為「地址」義，再後來又引申為現今通用的「靜止」「終止」「阻止」「禁止」「舉止」等等的意義；「易」原是動物名，就是蜥蜴，現在通用的意義「容易」是假借義；「豫」也是動物，是一種巨大的象，後來借作「寬豫」「豫備」「豫樂」等義。這些字義是因時代而變遷的。還有因地方而變遷的，古時候有雅言方言的分別，雅言就是標準語（官話），方言的語彙須用雅言解釋，如「爾雅」釋言篇說「斯侈，離也」，「斯侈」是齊陳等地的方言，離是雅言；揚雄「方言」說：「黨、曉、哲、知也，楚人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方言是一義數

字的重要成因。

古書字義最難了解的是虛字，虛字就是連詞、介詞、助詞、嘆詞以及代名詞等，這些字多係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廣泛地使用同音通假，寫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難辨識。例如「由」「猶」「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於」字解；「粵」「越」也同作「於是」字解。（書經禹貢：「九州攸同」，就是「九州用同」或「九州因而統一」的意思。大誥：「大誥猷爾多邦」，就是「大誥於爾多邦」或「正式向你們各邦宣言」的意思。）清王引之「經傳釋詞」一書，專為解釋古代同音通假的虛字而作，舉例很詳，解釋很合理，過去有許多不可解的文句，意義都因此而明顯。

一六 訓詁學

訓詁原屬於小學，即文字學中專講字義的一部分，後來因為有人專門研究訓詁，分途發展，於是獨立成一部門。詁從古言，是以今語解釋古語；訓與順同音，

是順着語義去解釋，這好像是下定義，立界說一樣。訓詁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語解釋古語；（二）以雅言解釋方言；（三）以俗語解釋文言。

「爾雅」是周代的字書，爲古代訓詁學的權威著作。其中「釋詁」一篇，是以今語解釋古語；「釋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釋方言；「釋訓」一篇，是以通用語解釋文言。後世仿照爾雅的著作有「小爾雅」「廣雅」（兩書多談同聲之字的互訓）「駢雅」（蒐羅複音語彙頗多）等。漢儒訓詁工作，表現於羣經諸子的注解。訓詁專書則有「方言」（揚雄撰），「白虎通」（班固等作）「釋名」（劉熙作）以及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一書，兼論字形字義字音三項，而能夠溝通三方面的關係，是文字學者珍視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氏福保輯諸家注解而成「說文解字詁林」六十八冊，頗完備。劉熙「釋名」，以字音解釋字義，有清朝江聲及畢沅的疏證。「白虎通」本是解釋典禮的書，但也注重字義的解釋，有近人陳立的疏證。唐人訓詁之學表現於

義疏，義疏是對於漢人的經注再作解釋，後人所謂十三經注疏，是合漢人的注與唐人的疏而說的。注疏的規律，是注服從經，疏服從注。宋代訓詁，不大根據古說，如朱子說「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是望文生義；又常引佛書的話，如「虛靈不昧」「明性復初」「常惺惺」等，來解釋經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語，如「工夫」「東西」等來解釋的。

訓詁學以清代爲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及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阮元的「經籍纂詁」，蒐集材料很多，可說是集大成的訓詁學書。王引之的父親念孫也精於訓詁，著「廣雅疏證」，引之所著「經義述聞」，也和訓詁有關。近人劉師培著有「古書疑義舉例補」，今人楊樹達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又根據王引之的「經傳釋詞」而作「詞詮」，對訓詁學頗有新的貢獻。

一七 文法學的先驅及其發展

王引之「經傳釋詞」，意在發現古代語文中語詞（虛字）的用例及古人說話

的詞氣。詞氣表現的方式就是語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說是中國文法學的萌芽。除王氏外，劉淇也是文法的先驅，劉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謂助字即全部虛字的總稱，劉氏將它分成三十類，比之王氏更有系統。到清末馬建忠，仿西文葛郎瑪著「馬氏文通」，文法學便成立了。馬著用西文義例解釋我國古書的文法，雖然有些牽強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說及今日通用語言，無益於言文一致運動，如國父在「孫文學說」中所指出者，但從此使過去所謂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古文奧妙，比較地變得平常易懂了。文法現象與語言同時產生，但文法的研究則在文字發生了好久以後。從學術的傳統看，文法學是訓詁學的一個分支，但馬建忠以後的文法學，却是受西文的影響較多。過去訓詁家對於文字已有虛實的分別（起於宋代），宋以前則以「名」與「詞」相對舉，劉熙「釋名」不涉及虛字，許慎「說文」解釋虛字，都稱為詞，可以為證。「爾雅」於解釋各類名物以外，還有「釋詁」「釋言」「釋訓」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

法性質。這可見古代訓詁學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罷了。文法學也是讀古書所必需的工具。馬氏以後，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釗陳承澤楊樹達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國文典」，陳氏著「國文法草創」，楊氏著有「馬氏文通刊誤」「高等國文法」「詞詮」等書，王氏著有「中國文法學初探」，陳王兩書較佳。

一八 方言學

方言研究也屬於訓詁學。如「爾雅」釋言，就是將方言解釋作爲訓詁的一部分。到揚雄作「方言」，然後有研究方言的專書。揚雄的書是搜集當時各地方言，互相比較，互相貫通，以便利了解當時人們的著作和談論，不是爲讀古書而作。不過我們現在可利用它做讀那時候古書的參考。清杭世駿作「續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則與揚雄的著作不同，並不爲現代中國人互相了解其方言而作，而是爲讀古書作的，它們乃是從古文字中尋求現代俗語的語源，從現代俗語

中尋求古代文字的讀音，這樣地溝通今古，一方面要使人們從現代俗語而了解古文字的意義，另一方面要使人們用適當的古字來書寫現今的俗語。而章氏太炎還提出一點意見，說北方各省經過五胡之亂及金元入寇，語言大受外族影響，聲韻變動更大，爲了振起大漢的民族精神，非「革夷言而從夏聲」不可，因此，凡合乎古文字的現代口語，才是值得提倡的正統語音。章氏想憑主觀的幻想去改變數千年已成之局面，自是書生之見，但其保衛民族語文的原則，殊可寶貴，如果具體地應用於防範倭夷的語文侵略，是很對的。

一九 字音的變遷

漢字不是拼音的，形聲字的聲符不夠精密，字音的改變不容易看出，但從有韻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測。例如詩經「邶風·擊鼓」篇拿「于林之下」和「爰居爰處」押韻；「凱風」篇拿「在淩之下」和「母氏勞苦」押韻；「大雅·緜」篇拿「至於岐下」和「率西水滸」押韻。這可以證明「下」字在周代是和「處」「苦」

「濟」同韻的。但唐宋時代的「廣韻」，則將「下」字編入馬韻，胡雅切，可見它的音已讀變了。又如「詩經關雎」篇「寤寐思服」和「求之不得」及「輾轉反側」押韻；「楚辭離騷」拿「非時俗之所服」與「依彭咸之遺訓」押韻；但「廣韻」「服」字在屋韻，房六切。這又是字音的轉變了。字音大致是隨着語言變遷，既變之後，不可能回復古音，這是自然的趨勢，文字學家有時不明白這一點，竟主張大家改讀古音，如章太炎反對白話文，說現在一般人不通小學，本來「之」字古音近於「的」，「夫」字古音近於「吧」，「矣」字古音近於「哩」，但一般人有現成的「之」「夫」「矣」不用，而另造一套「的」「吧」「哩」，未免太不合理。他這種批評其實是不顧事實。試問將「之」「夫」「矣」等字改讀古音有沒有實行的可能？另用「的」「吧」「哩」又有什麼不好？不過章氏這樣地指出，雖然對於現代讀音沒有裨益，但對於古書的了解就增加了很多便利，因為這樣一來，對於古人的語氣更覺得活靈活現，容易了解而有趣味。懂得古代

的字音，又可以明白古字的同音通假，這可說是有助於訓詁。懂得古字的讀音，讀古代詩歌韻文，也較爲音調諧和。所以字音變遷有知道一點的必要。

二〇 語言和文字的分離

漢字讀音，固然跟着語言變遷，但有些字音，語言裏面並沒有變，而文字變了，卽如上文所說「之」字「夫」字，古音和「的」字「吧」字相近，可見口語中的「的」「吧」原是「之」「夫」古音的遺留，只因爲文字上把「之」「夫」讀變了音，所以另用「的」「吧」兩字來代替。我們爲什麼知道古音「之」「夫」和「的」「吧」相近呢？因爲據專門研究古音的錢大昕氏推定，古時候沒有知微澄非敷奉微等紐（卽出牙尸ㄥ方等聲母），凡輕唇音讀如重唇音（文讀如門，望讀如茫，封讀如邦，馮讀如憑，拂讀如弼，無讀如模，扶服讀如匍匐），舌葉音讀如舌尖音（直讀如特，沈讀如潭，陳讀如田）。大約到中古時期，輕唇音與舌葉音發生，有一部分重唇音與舌尖音的字，在口語上變了輕唇音與舌葉音，另

有一部分還沒有變，如「之」「夫」之類。但在古音沒有大變的時候有人創造反切的法子，拿兩個字拼合來注第三字的音。反切的上一字代表聲母，假如後來反切第一字的語音變了，所注的字音即使在口語上沒有變，在文字上也會跟着變，因為士大夫對於書本上的注音是非常尊重的，這樣就造成了語音和字音的歧異。久而久之，文字的讀音和語音隔離，人們便不知道口語中的「的」「吧」等音就是「之」「夫」等字的口頭讀法了。現在我們讀「烏」字，口語音是勿一么，文字音是广一么，也是字音變了，語音沒有變，虧了有實物作證，人們還能知道它們的聯繫。至於虛字，在語文分離以後，便不容易找到聯繫了。語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國古書不易讀的最大原因，不但因此古書難讀，便是現代文言文也不是一般民衆在短時期內所能學習的。

一一、雙聲疊韻

聲母相同，叫做雙聲，例如「參差」是雙聲字，因為聲母都是方；「高岡」

是雙聲字，因為聲母都是ㄍ。韻母相同，叫做疊韻，例如「繚繞」同屬ㄠ韻，「螳螂」同屬ㄤ韻，都是疊韻字。雙聲字，聲韻學家稱為同母之字，訓詁學家稱為一聲之轉。疊韻字，聲韻學家稱為同韻之字，訓詁學家稱為音近之字。讀古書應注意雙聲疊韻的現象，因為（一）古書上的人名物名以及複音的形容詞動詞等，多係雙聲字或疊韻字，例如「澹臺」「滅明」「蒹葭」「唐棣」「蜘蛛」「蝮蝮」「忸怩」「踟躕」都是雙聲字；「皐陶」「芙蓉」「崑崙」「窈窕」「展轉」「崔嵬」「優游」「逍遙」都是疊韻字。又（二）雙聲疊韻的字，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很多，所謂轉注或假借字，常常可以從雙聲疊韻的關係上去觀察。例如「粵」與「于」，「印」與「我」，「復」與「返」都是可以互訓的雙聲同義字；「乾」與「健」，「坤」與「順」，「坎」與「陷」，「離」與「麗」，「考」與「老」，都是疊韻同義字，以上都是轉注。還有雙聲假借字，如借「乃」為「仍」（仍的本義是「因」，乃的本義是「曳辭之難」，就是轉折連詞，仍從乃得聲，

可知古時乃仍雙聲，故借乃表「因」義，借「利」爲「賴」，（賴從貝字得形，從刺字得聲，本義是贏利；利字從刀，是鐵器，現在拿它代替賴）。有疊韻假借字，如「易經」借「羊」爲「祥」，「書經」借「麓」爲「錄」。明白雙聲疊韻和字義相通的關係，對於古書的了解大有幫助。

一二二 反切

反切是漢字的注音方法，發明的年代大約是漢朝，正式應用是從東漢孫叔然的「爾雅音義」開始。在反切未發生以前，注音是用「直音法」，如「說文」中間的某字讀如某。這種方法，遇到沒有同音字的場合，就不能注，所以就有人發明反切的法子，合兩個字來拼成一個字的音。這個法子當初叫做「反」，後來叫作「切」，再後來合起來叫，便是反切。反切的規律，是上一字與所注的字爲雙聲，下一字則爲疊韻，例如「都，東姑反」，都東雙聲，都姑疊韻。「公，姑翁切」，公姑雙聲，公翁疊韻。但反切所用的字，與拼音所用的字母不同，是代表

音素的，是代表音節的，因此大半不能連讀二字而成一音，清陳澧「切韻考」說：「連」續二字成一音，誠爲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魚歌麻諸韻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魚歌麻韻無收音（樸按有韻母卽有收音，陳說似非是，不過這些不是複韻母，也不帶鼻音，與後面的韻母拼切，尙不困難），而喉音直出（樸按單用韻母的字，音在口腔不受阻礙，故云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連而成一音，否則中有窒礙，不能相連矣，然必拘此法，或所常用者有音無字，或雖有字而隱僻難識，此亦必窮之術也」。反切的這一缺點，直到國語注音符號產生，方才獲得澈底的挽救。例如「東」的注音是ㄉㄨㄥˊ，「姑」是ㄍㄨ，以「東」「姑」切「都」，則「都」的音成了ㄉㄨㄥˊㄍㄨ，中有韻母ㄨ及聲母ㄍ的窒礙，現在取「東」的聲母ㄉ和「姑」的韻母ㄨ相切，得了ㄉㄨ，便毫無窒礙了。而且注音符號的數目很少，不像雙聲疊韻字的漫無限制（如都字又可以用多姑切，大孤切等）。

一三四聲

單音字太多的語文，常常要靠聲調的抑揚高低來分別同音字。我國自漢以前，字的聲調就有長短的分別，例如「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的何休註，解釋「伐」字，說「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即係用長短音分別主動被動的意義。到南北朝齊梁之間，周顒著「四聲切韻」，沈約撰「四聲韻譜」，於是字的聲調又有平上去入的四種分別了。除四聲說外，又有五聲說（將平聲分陰陽二類）七聲說（平去入都分陰陽）八聲說（四聲都分陰陽），現在粵語且有九聲的分別（入聲有三種）。但就讀書的應用說，讀六朝以後的詩文詞曲，以及翻檢韻書，都祇須懂得四聲。平上去入的分別是：（一）平聲長，上去較短，入聲最促；故上去入又統稱仄聲。（二）平聲始終如一，沒有升降；上聲由低升高，去聲由高降低；入聲短，無所謂升降。因此唐「元和韻話」說：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至於陰陽或清濁的分別，

是陰清較低，陽濁較高（粵語入聲分高中低三種）。

二四 聲韻學

聲韻學或稱音韻學，本是小學的一部分，後來獨立而成專門之學。因為漢字不是拼音的，而研究漢字讀音的聲韻學仍用漢字作為表音的工具，所以非常模糊不清，令人有奧妙神奇之感，過去「康熙字典」上所附的等韻表，多數知識分子都是不懂的。少數國學專家如章太炎者，懂得了聲韻學的訣竅，便誇張地說：「窮言音理，大地將無解音之人」（「國故論衡」音理篇）。其實過去這門學問所以神妙的原因，是因為我國沒有適當的表音符號（拿漢字來當做表音符號，極不精密，前在反切一節已經說過）。現在除注音符號外，可資補助的有西文字母，並有萬國音標，工具比較漢字精密便利得多。對發音部位的分析，現代語音學也更其精確而明白易曉。我們如果要研究中國聲韻學，首先必須把握這些現代知識，有了新的工具和新的觀點，便會知道我國聲韻學並不奧妙，而且有許多不精密不

正確的地方。

每個字的音，可以分爲發聲收聲兩部分，發聲爲「聲」，可以用聲母代表，收聲爲「韻」，可以用韻母代表。聲母的音，在通過聲門（喉嚨後），被阻於口腔內，因其被阻的部分而形成種種不同的音，如雙唇阻形成ㄉㄌ，唇齒阻形成ㄈㄌ，齒齦舌尖阻形成ㄋㄌㄎㄌ，舌根軟腭阻形成ㄍㄎㄎㄎ，舌面硬腭阻形成ㄑㄑ，舌頭硬腭阻形成ㄔㄔ，另有接近硬腭的捲舌音兒，列入韻母。韻母的音，在口腔內是不受阻礙的，但由口的開合，舌的升降而形成種種不同的音，如一又ㄩㄩㄨㄨㄨㄨ等，是單韻母，合ㄩ一爲ㄚ，合ㄨ一爲ㄛ，合ㄩ又爲ㄨ，合ㄨ又爲ㄛ，這都是複合韻母，還有帶聲韻母，如ㄇㄏㄨㄌ，都是帶了鼻聲ㄛ收聲的。以上是現代的國音。古音及現代閩粵方言的音，比較複雜，如帶聲韻母還有帶ㄨ，ㄨ，ㄨ或ㄛ的。這些複雜內容都是聲韻學的研究對象。

我國古今音韻的變遷，大概可分三個時代，而研究音韻的學問也可分爲三

支。第一個時代是古音時代，就是周秦漢數朝，這時代的音韻，近三百餘年內，方才有些學者加以研究，稱爲古韻之學。第二個時代是所謂今音時代，其實應當改叫中古音韻的時代，就是魏晉以至唐宋諸朝，這時代的音韻的研究，即所謂廣韻之學，一般人都認爲是隋朝陸法言開創的，而完成於宋朝。元明清詩文所用的平水韻，也是抄襲廣韻的。第三個時代是元明以來，這時期口語的通行音韻以北方爲標準，比較中古音韻簡單些，當時通俗文學「北曲」用韻採取口頭的標準，而不用與口語分離的廣韻，於是有代表北方音的「中原音韻」一書產生，到清朝又有「五方元音」，所分韻目，漸漸和國語注音符號相接近。但第三期的音韻是當代的，不必考古，這時期一般學者注意研究的是怎樣用聲母和韻母來拼切字音，使反切更精密而有規律，這就是等韻之學。

等韻學是研究反切及字母（這字母就是聲母）的運用的。反切之學發生最早，前已說過。等韻的名稱係元朝劉鑑所創，他根據宋朝人著作，著「切韻指南」

將每一聲母所切之字，按照其與韻母拼切時聲音的洪細，分成四等排列，即分爲開口呼齊齒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等呼，以便切音，這就叫等韻。

二五 字母

字母是唐朝末年守溫和尚仿照梵文創造的，共三十六個。這一套聲母所代表的音，比現在國音複雜些，但比較魏晉到隋唐之間的音簡單些。六朝時期反切中所包含的聲母有四十個。現在國音聲母二十四個，其中ㄐㄑㄒ還可以合併於ㄍㄎㄌ。守溫聲母是：

見（ㄍ或ㄑ）溪（ㄎ或ㄑ）羣

疑（ㄎ或ㄑ）

牙音

端（ㄉ）透（ㄊ）定

泥（ㄋ）

舌頭音

知 徹 澄 娘

舌上音

幫（ㄅ）滂（ㄆ）並 明（ㄇ）

重唇音

非 敷（ㄆ）奉

微（ㄨ）

輕唇音

精(ㄐ)清(ㄑ)從 心(ㄒ)邪

齒頭音

照(ㄓ)穿(ㄔ)牀 審(ㄕ)禪

正齒音

影 曉(ㄒ或ㄒ)喻 匣

喉音

來(ㄌ)

半舌音

日(ㄖ)

半齒音

據清朝陳澧考訂，六朝隋唐間的聲母，應於上列二十六母外，再加「于」「神」「莊」「初」「山」五母，是爲廣韻四十一聲母，排列如左：

深喉音：影 喻 于

淺喉音：見 溪 羣 曉 匣 疑

舌音：端 透 定 來 泥

知 徹 澄 娘

照 穿 神 審 禪 日

齒音：精清從心邪

莊初牀山

唇音：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六四十一母中，影子知徹澄莊初牀山敷十母，今人都不能讀出，其餘今音都能分別，因有些音還存在於方言中，例如羣定等濁母，現江南話裏面還有。（羣定即英語中的 G D）。

二六 韻部

韻母的產生在聲母以前，也是受了印度的影響。隋朝陸法言所作「切韻」是第一部有價值的書，後來「唐韻」及宋朝的「廣韻」都根據它作的。廣韻列舉韻母二百零六個，一則因為過去語音本來複雜一些，二則因為那部書對於每個複合韻母帶聲韻母，平上去入的每個聲調，都給予一個特殊的名稱，所以數目有那樣多。

到南宋時平水韻，就將韻部合併爲一〇七，明洪武正韻，又合併爲七六。等韻學家又將它們歸納於十五韻攝，每一韻攝分開齊合撮四呼，拿國音符號打比方，凡丫亡等單韻母以及ㄇㄣㄥ等帶聲韻母，上面不加一又ㄩ三母的，都是開口呼，加一母的叫齊齒呼，加ㄨ母的叫合口呼，加ㄩ母的叫撮口呼。現在以國音符號代替韻攝，將廣韻韻目（以平聲的爲代表）列在下面，以表示中古音韻向近代的簡單化：

一 脂支微之齊祭廢

ㄨ 縷虞

ㄩ 魚虞

ㄩ 麻

ㄨ 歌戈

國 學 常 識

ㄨ 麻（該韻中車遮者蛇等字）

ㄟ 灰

ㄨ 佳皆哈泰夫

ㄩ 蕭宵肴豪

又 尤侯幽

ㄩ 元寒桓刪山先仙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ㄩ 江陽唐

ㄩ 眞諄臻文殷魂痕侵

ㄩ 東冬鍾庚耕清蒸登

ㄩ 支脂之（諸韻中兒耳二諸字）

二七 古音之推定

古音之學，萌芽於宋，而發展於清。清初顧亭林作「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稱爲「音學五書」，他根據古代韻文推定古

學的本音，對於從前叶韻改讀的講法認爲不對。其後江慎修作「古韻標準」，段玉裁作「六書音均表」，載東原作「聲類表」，孔廣森作「詩聲類」，王念孫也有韻分部的研究。近人章太炎作「成均圖」（按均卽韻字），其門人黃季剛（侃）繼起，分古韻爲二十八部，這是古韻的最後結論。關於古韻的學說，最重要的有近人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韻歸麻說（汪氏是就外國古來傳述的中國語及中國古時音譯的外國語——主要的是梵語——而研究它們的發音，得到的結論是凡屬已韻或□韻或×韻的字，古時都屬Y韻）至於古代聲母，清代錢大昕提出「古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及「古無輕唇音」二大主張，以證明古時缺知徹澄非敷奉微等紐（紐就是聲母，類隔是指古音反切，可用聲音相似而不同類的字爲紐，例如「方」應爲府良切，也可作溥良切。所謂類隔之說，就是認爲古人讀音不大精密正確，把不同音的字當作同音。其實當時某些音根本沒有，並無所謂類隔，卽如方字本讀如旁，府字本讀如溥，並不是隨便亂讀），章太炎又作「古音娘日二紐歸

泥說」，黃季剛再由廣韻的三十二古本韻考定，所得的最後結論是古紐十九個。

古紐卽影(喻子)、見、溪、曉、匣、疑、端(知照)、透(徹穿審)、定、(澄神禪)、來、泥(娘日)、精(莊)、清(初)、從(牀)、心(山斜)、幫(非)、滂(敷)、並(奉)、明(微)——括弧內聲母是應合併的。古韻是歌戈、灰、齊、模、侯、豪、蕭、哈(以上陰聲)、寒桓、先、痕魂、青、唐、東、冬、登、覃、添(以上陽聲，卽在陰聲後面加 p, p', p'' , m 收音的)、曷末、屑、沒、錫、鐸、屋、沃、德、合、帖(以上入聲，卽在陰聲後面加 t, k, p 收音的)，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四部，兼有開口呼合口呼，廣韻分成八部。又，古音沒有四聲的分別。

第三章 古物

二八 金石之學

探討古代文化，不僅須讀古書，而且須研究古物，因為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會生活的指標，而繪畫雕刻文字的斷片尤其是古人思想的紀錄。我國人對於古物的研究，早加注意，遠在西洋考古學產生以前，即有所謂金石之學產生。金者指商周青銅器，石者指秦漢以來的紀功碑，墓誌，佛教的摩崖石刻等。金石文字，可以拿來參證歷代史實，補正正史的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是古文字學及古史學的重要研究材料，即其器物本身的質料花紋和式樣都有一定的時代性，因而也具有歷史的意義。宋朝以後，我國銅器出土的漸多，拓印金石文字也都成風尚，所以金石之學即產生於這時期，如歐陽修編的「集古錄」，呂大臨編

的「考古圖錄」，趙明誠編的「金石錄」，即係初期研究報告。由宋至清，雖然蒐集與研究金石的人還不少，如黃伯思、董道、王俅、王厚之、張綸、錢坫、曹奎、吳榮光、劉喜海、吳式芬、吳大澂、劉心源、端方等。但大部分古物是在富貴人家或古董商人手裏，摩挲撫玩，未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而文人學士，也大都不過賞鑒金石文字的美術，臨池篆刻，使金石成為書畫的附屬品而已。直到清代乾嘉兩朝，考證學者輩出，方才大大發展了金石文字的研究。近來孫詒讓、容庚、鄒安、陳寶琛、王國維、羅振玉等，又各有新的攷證。關於金石的著作，除前述數種外，如黃伯思的「東觀餘論」，董道的一「廣川書跋」，王俅的「嘯堂集古錄」，王厚之的「復齋鐘鼎款識」，張綸的「紹興內府古器評」，錢坫的「十六長樂堂吉金圖」，曹奎的「檇米山房吉金圖」，吳榮光的「筠清館金文」及「昭陵復古錄」，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篇」及「洛陽存古錄」，吳式芬的「據古錄金文」，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的「恆香所見所藏吉金錄」及「

窗齋集古錄」，劉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的「匋齋吉金錄」，容庚的「寶蘊樓彝器圖錄」，陳寶琛的「澂秋館吉金圖」，羅振玉的「殷文存」，鄒安的「周金文存」，王國維的「金文著錄表」等，都頗著名。考證之作，如王國維的「觀堂集林」，「說文諧聲譜」，孫詒讓的「古籀餘論」，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以及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部頗精采。王國維氏根據金文而作的「鬼方昆夷獫狁考」及「古諸侯稱王說」等文，都是史學上的重要著作。王氏的「金文著錄表」將過去各金石學家的收穫，作了詳備的記載，又郭沫若有一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都便檢閱。（清代有官修的「西清古鑑」，亦金文書。）近年來金石研究，更擴大到遼、金、蒙古碑文的考釋了。




二九 殷墟發掘







清光緒二十四五年間（一八九八——九），河南安陽縣西北小屯村，掘出無數龜甲獸骨的破片，上面刻着古文字，內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紀錄，因安陽是

都，此項甲骨文字被稱爲殷墟文字。此項發現完全出於偶然；在以前，或已被當地農民發現而不爲人們所注意；但到前世紀末，有濼縣骨董商人范某將甲骨運到北平，輾轉而入「老殘游記」作者劉鐵雲（鶚）之手，劉氏繼續蒐集達三四千片以上，拓印「鐵雲藏龜」一書問世，才引起世人的注意。一九〇二年，羅振玉在劉氏處得見龜骨，也繼續蒐集，並探知甲骨出自安陽小屯，派人直接採取，達三萬片之多。羅氏於是拓印「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鐵雲藏龜之餘」「殷虛書契後編」等書，都很精美。羅氏於一九一六年又親訪小屯，並於甲骨文之外，兼注意器物的搜求，雖一破爛的石刀石斧，也很重視。他這種見解超越了過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說是近代考古學的先驅，因之羅氏編印的「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殊可珍視。至一九二八年十月及次年四月，董作賓李濟等教授又在安陽作有計劃之發掘，新獲卜辭三百餘片及玉器石器陶器銅器等，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並將所得材料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精密研究之。

從這次起，殷虛是用現代考古學的眼光來發掘了。

三〇 甲骨之學

自殷虛古物出土而甲骨之學隨之產生，甲骨之學的第一步，就是殷代文字的研究，它使得過去純粹憑藉「說文」的文字學不得不有所修正。我國文字學向來僅以「說文」爲準則，等到金石之學發生，學者就已有些兒引用金文來訂正許書得失的，到甲骨文出世，人們又將它和金文比較研究，不但可以糾正許書的錯誤，還可以證明字原。這可分幾點說：（一）考知原始文字的形體和文法。研究甲骨，方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摹仿鳥獸足迹。其行款讀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並沒有一定的規則。（二）證明所謂籀文卽古文，許書所謂籀文與古文不同，是錯誤的，例如許書「四」字古文作，籀文作，今卜辭中四字正是作。（三）得知古象形字，一字有各種寫法，筆畫原來沒有一定。（四）與金文互相發明。有些甲骨文與金文完全相同，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一、元、天、方、且、王、中、平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認識，得甲骨文而後認識。如甲文字字作，而已字作或作。因之金文中過去所不能解釋的「乙子」「丁子」「癸子」，現在都能釋爲「乙巳」「丁巳」「癸巳」。(五)糾正許書的錯誤。「說文」中的古文，如一下出式，二下出式，三下出式，中下出式，册下出式，都是甲文與金文所沒有的。又籀文如馬下出式，車下出式，也是甲文金文的筆誤。篆文也有弄錯的。如鬪字，篆文，許注「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鬪之形」。但卜文僅像兩手對打的形狀，不見兵杖之形，許說錯了。又如福字，許注「備也，從示畱聲」。但卜辭中作，從音，乃尊也，會意，非形聲字，許說誤。又如邑字，許注「國也，從口從卩」，今卜辭作，多即象人席地之形，非從卩，許說亦誤。(六)說明文字的變遷。如將甲文，金文，篆文，隸書排列來觀察，可看出逐步演變的痕跡。研究甲骨文從清代孫詒讓開始，而以羅振玉、于國維爲最著。其次則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羅福成、唐蘭、徐永梁、吳

其昌等。他們的研究，漸由文字學而走向史學方面，如王國維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殷周制度論」等。這門學術的著作，如王國維之「海寧王忠愍公遺書全集」，羅振玉之「殷虛書契考釋」，郭沫若之「甲骨文釋」，均甚重要。初步研究則以檢閱商承祚論「殷虛文字類編」爲宜。

三一 古物與社會學

近代考古學，是以社會學的眼光，研究無文字的史料，以資推測遠古的社會狀況之用。先史時期的歷史既不會用文字記載，便只有靠傳說以及遺骸遺物保存下來，但傳說因被人們誇張或修改使之神祕化，不容易了解，非得古物參證不可，古物是真憑實據，所以更加重要。社會史家對於先史時期的階段區分，完全以器物爲標準，即由石器時代進到青銅器時代，再進到鐵器時代，石器時代又分爲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石器時代最長，以數十萬年計，是人類野蠻蒙昧的階段，到青銅器時代，文明漸啓，可說是半開化階段，鐵器時代，方才正式踏入文

明的階段。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春秋戰國開始。春秋戰國以前，所謂三皇五帝，堯舜禹湯的歷史，完全是後人追記的傳說，其真相不易明瞭。但自從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傳說又得了一部分文字記載的證明。而殷周青銅器如鍾鼎盤盂之類以及銅製的器兵如戈戟之類，又足以證明當時是青銅器時代。近年我國史家漸漸公認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還是野蠻蒙昧階段，當時還沒有國家，只有氏族社會的部落，這都是參考古物與傳說的材料而用社會學的理論來解釋的。

三二一 無文字的古物

有文字的古物，即刻有銘文的銅器，石碑，以及刻有卜辭的龜甲獸骨等物，我們在上面幾節中已經說過，此外還有西域考古的種種發現，其中有漢魏至唐的簡牘書冊以及各小民族已死的文字，我們將於第三五及六九節再說。無文字的古物，在殷虛發掘中已經發現過一些，同時在周口店及河套等地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在仰韶，辛店等地又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周口店離北平五十公里，一九二一年，有瑞典人安特生，充當北京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顧問，在該地一石灰洞裏偶然發現了一片石英，但該地是不產石英的，這片石英必從別處帶來的，因而引起多人的研究興趣，後來有一些中外學者繼續探查發掘，約經十數年，竟發現了大批化石，其中有廿五種是一種猿人的骨骼，因定名為「北京人」。同時又在北京人骨骼之旁發現二千多種工具。又發現了堆積很厚的灰層，因而知道北京人已發明了用火，而且在該地居住過幾千年的時光。從北京人能製造工具及運用火兩點看，雖說他們骨骼仍帶有許多猿猴的特徵，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們是真正人類的最初形態。北京人的存在時期，大約在四十萬年以前。在中國考古學的分期，以北京人時期為最早，屬於前舊石器時代，又稱前周口店時期。

後舊石器時代，就有河套文化（由河套掘出古物所代表的文化），後期周口店文化。還有尾舊石器時代，由達賴湖文化代表着。新石器時代則可分為六期，

每期約三百年。第一爲齊家期，係以在甘肅臨洮縣齊家坪掘出的石刀、石斧、尖骨和單色紋形的陶器代表之，大約爲公元前三、五〇〇至三、二〇〇年間的文化。第二爲仰韶期，係以河南渾池縣仰韶村所發現的石刀、石斧、石耨、石杵、石鏃、石戈、石環、石紡車、骨鏃、貝鏃和角針，以及有色陶器等爲代表，大約是公元前三、二〇〇至二、九〇〇年間的文化。第三爲馬廠期，大約是公元前二、九〇〇至二、六〇〇年間的文化。第四爲辛店期，此期除石器骨器陶器外，還發現有銅器，大約是公元前二、六〇〇至二、三〇〇年間的文化。第五爲寺窪期，以甘肅狄道縣寺窪山爲代表，約當公元前二、三〇〇至二、〇〇〇年間。第六爲沙井期，代表地址在甘肅鎮番縣附近，約當公元前二、〇〇〇至一、七〇〇年間，發現有有翼的銅簇。

殷虛古物也代表着公元前、七〇〇年之文化，在殷虛文化以前，還有所謂龍山（山東地名）文化及仰韶文化。

關於這些考古工作的記載，有安特生的「甘肅考古記」，「西陰村史前遺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各種考古調查報告及發掘報告等。此外曾松友著「中國原始社會之探究」，日人橋增吉的「東洋古代社會史」，森谷克己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也說及了。

北京人和中國民族的血統有沒有關係，還沒有經過證明。但是熱、察、甘、新、青、晉、綏、豫、陝等省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人骨，確已證明與現今的華北人同型。

三三一 古物與考證學

考證學的工作是對於歷史材料的整理和檢訂，它可以算做歷史研究的一部分。過去我國學術以儒家為中心，因此考證學的對象就只是儒家經典上的禮制名物，而考證學的觀點也受了經典記載的限制。例如羅振玉氏在安陽小屯村獲得一種形狀類似犁鏕的石器，他就以為是經書上所說的石磬，但這種東西和「周禮考工

記」所說的形狀又不相同，於是他就推論到殷周曆制的不同。（見羅氏雪堂叢刊五十日夢痕錄）但郭沫若氏則以為羅氏所云當即石犂，未必是古曆。這就是表示着他們兩人學術範圍有廣狹之別。羅氏始終拘守儒家的傳統，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經的記載，郭氏貫通中西學術，故能從社會史的觀點去推論。又如王國維氏，在他的「殷周制度論」裏面，對殷周之際政治文化的劇急變革，頗多發明，然而他不知道怎樣解釋，只是讚美「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這也可見王氏思想之為儒家所限制。

考證學如果不超越儒家的舊傳統，如果對於古書上給予遠古傳說的塗飾與改造不知道分析，那麼對於古物的研究就會不能有很好的收穫。好在西方考古學及社會學等學科逐漸輸入我國，而西人來華的進行考古更促進了我國考古學的發展，這樣使考證學也日益進步了。

自從考古學逐漸發展以來，善於讀書的人對古書就發生了懷疑，覺得其中所說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經」「淮南子」上面的那些神話，什麼十日並出呀，女媧補天呀，盤古開天闢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類荒誕無稽，就是毫沒有神話意味的記載，如夏禹治水一類傳說，其真實性也大成問題。因為從殷虛卜辭看，殷代還那麼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樣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計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幾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內完成，當然不合理。但章太炎氏解釋說，禹當時的治水，不過總其成，各地當然分區辦理，各區也各有負責的人。章氏尊重古書，認為不可任意懷疑，故作這種辯護，其實當時我國尚在部落時代，像「禹貢」上九州那樣大的地盤，由一個政府統治，是決定做不到的。而且鐵的發現在春秋戰國之間，「禹貢」上居然講到梁州貢鐵，可見這書是戰國時人憑想像寫成功的。雖然初期疑古諸家有些離奇的臆說，如以禹為爬蟲，以墨子為印度人之類，不能有確切的證明，但大胆的假設也是科學所需要的。到了後來，一般史

家對於古書上的記載，無論是否神話，都認為有歷史的意義，而根據社會學的觀點給以合理的解釋。而這種解釋，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來作證明。例如姜嫄履大人足跡而生后稷，及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會學眼光看來，在氏族社會羣婚時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實在不是奇怪的事，後世父權時代，因為找不出父系祖先來，所以假託神話來掩飾。這種對於古書的新解釋，不但有充足的理論根據，而且有確切的事實佐證。因為「山海經」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虛卜辭中就有高祖爰及娥與義京和他們相當，經專家考證而知帝俊，高祖爰，帝嚳、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與義京兩女子，或作羲和與常羲，或作娥皇與女英，或作姜嫄與簡狄，在羣經諸子中表現為種種不同之傳說，如吞卵或履大人跡而生兒子呀，姊妹共夫，兄弟（舜與象）並淫呀，暗示着初民的血族羣婚及稍進一步的亞血族羣婚（這即是伴侶婚或彭那魯亞家族，其制度是姊妹共夫兄弟共妻）之存在。儒家按後世倫

常加以粉飾改造的古史，經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這可說是歷史科學在中國的初步勝利。

章氏太炎在「國故論衡·理惑」篇表示其對於卜辭之懷疑，認為是古董商的偽造，而堅信經典的內容及許氏說文的訓詁，大概章氏還不知道殷虛發掘已經經過專家的親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參考今日野蠻民族生活的方法，這是時代所限，我們不必認為是章氏的固執不通，但我們決不可跟着他去錯誤。殷虛發掘還不過是鋤頭考古學的初步，後來還不知道有多少寶貴史料已從或將要從地底下發現出來。除古物外，各邊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們能仔細考察，其給予我們讀古書的幫助，一定很多。試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如廣西徭民中有一種，其語言叫虹爲「𠂔一𠂔」，音與詩經上的「蝮蝮」完全相同，又疑問助詞有一個讀「𠂔一」的，和「哉」字相當，如果依「𠂔一」音去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

於我哉」那首古歌，韻脚就完全諧和。這不很明顯的是古代語言的實證嗎？（據卅一年十月九日桂林大公報載朱家驊氏的抗戰以來中央研究院概況，研究院之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考古學方面，除發掘小屯村外，還發掘了殷曆譜，兩城鎮，侯家莊，濬縣，輝縣，汲縣山彪鎮，川康大司空村，及四川彭山漢墓，又在綏遠，川康等地作了考古調查。在人類學方面，曾調查川康黔桂湘西等地少數民族的變化，研究畬民的圖騰文化；語言學方面，曾調查黔桂苗語等。）

K

第四章 書籍

三五 傳寫本與刻本

版刻印刷之術，萌芽於隋唐，宋時才有大發展，自唐以前，書籍的流傳，全靠抄寫。寫本의 書籍又分兩個時代，周秦漢爲簡冊時代，隋唐爲卷軸時代。簡冊時代的書，是在竹片（簡）或木片（牘）上用竹筆蘸漆書寫，或用刀子刻的（「史記」稱蕭何做刀筆吏）。多簡相連，則用繩子或皮革的帶子連繫起來，成爲冊子。秦漢間的漆書也寫在縑帛上，大約因當時蒙恬已發明兔毛筆的緣故（所以說文序有「著於竹帛」的話）。但直到西漢末年，竹書依然很多。古人所謂「汗簡」，就是去掉竹汁，「殺青」就是去竹上青皮，這都是預備竹簡爲寫字之用的手續。「漢書藝文志」上的書，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書，分卷的即帛書，

因爲縑帛是可以捲藏的。東漢時蔡倫因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發明用樹皮麻頭破布造紙，書籍於是比從前輕便而價廉。但直到東漢末年，紙還沒有普遍流行。魏晉時，松烟墨及凹心硯也發明了。文房四寶完成，於是到隋唐時，藏書機關，完全沒有竹木的簡冊，而圖書盡是卷軸了。卷軸就是將書頁捲在木軸上，如現今捲對聯的樣子。

漢武帝時，魯恭王拆孔子宅，於牆壁中得禮經尚書春秋論語孝經，都是竹簡書。晉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墓，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如「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共十六種。那些原物早已不存。近時甘肅敦煌千佛洞發現古時書籍多種，包括漢武帝時木簡漆書，唐懿宗時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寫本，是現在僅存的古書源物之一重要部分。按敦煌縣南有鳴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旁即莫高窟，有石室千餘，四壁都是佛像，世稱千佛洞。公元千九百年，寺中道士於掃除之時，偶然弄破了牆壁，發見壁內有一藏書室，自漢至五代之書籍碑

版，及手鈔之書，貯藏極多，一九〇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聽說，前往收買，運回歐洲，現藏於倫敦博物館。法國人伯希和又來搜尋一批，運回巴黎博物館。後經我國政府取締，並收集其殘餘者保存之，方才沒有全落外人之手。還有人從巴黎倫敦抄回來一些通俗文學，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學零簡」等書。又，敦煌附近沙漠地帶亦發見漢簡。王國維氏曾根據它著了「流沙墜簡」等書。此外西北各地發見竹木簡書，還有多起。

自印刷發明後，手鈔本之古書，常常可以校正印本的錯誤，所以非常寶貴。清乾隆修「四庫全書」，因卷帙浩繁，亦未曾付印，僅抄寫七份，分存七處藏書樓。

刻本以宋板書爲最珍貴，但宋版不止一種，其中也有錯漏較多的。其次元刻的書，也比較被人重視，清代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過去有些藏書家，專門蒐集善本書，因而發生版本之學。

其實版本的正確性是比較的，無論什麼版本，經過數千年的傳寫與翻印，錯誤總是難免的，不過有多少不同或此正彼誤的分別而已。現在印刷術進步，許多善本書，都經書商影印行世，我們如果不是古董收藏家，專為讀書起見，那末善本的影印書，就很可能滿足了。

三六 版本之學

版本學本是校讎學的一部分，每一書蒐集衆本，比較其好歹，分別評判而介紹之，就是它的任務。這門學問萌芽於西漢，劉向父子校書（參看第三七節），廣集衆本，想必他們對於版本的辨別，一定很精密。宋朝岳珂刊九經三傳，所根據版本廿三種，由專家反覆參訂，這也是為校讎而研究版本。至無錫尤袤氏「遂初堂書目」創一書兼載數本之例，凡講目錄學的也得研究版本了。清代版本之學發展而成專科，名家不少，如黃丕烈、顧廣圻、丁丙、陸心源、莫友芝、葉昌熾、繆荃孫、葉德輝等。重要書籍有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敘述藏書的掌故；

江標所輯的「宋元本行格表」，講版式；錢泰吉「曝書雜記」、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陸心源「麗宋樓藏書志」，葉德輝「書林清話」等，講各種書的版本。羅振玉「鳴沙石室祕錄」，則係講敦煌石室古書版本的。

三七 校讎之學

校讎之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校讎學，包括校勘學、版本學及目錄學三部分的内容，其任務是：蒐集圖書，辨別真偽，考訂誤謬，釐定部次，裝璜保存，即整個整理書籍的專門事業，有一部分和現代圖書館學極相類似。狹義的校讎學就是校勘學，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確，而改正古書因傳寫日久而產生的錯誤，儘可能的恢復其本來面目。校讎兩字的意義，就是劉向「別錄」所謂「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校勘的法子以後者爲好，因爲單用一種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謬誤是有限的，必

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若怨家相對」，方才可以發見較多的錯誤。

公認爲校讎學的先驅者是劉向劉歆兩父子。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死，他的兒子歆繼其業，總羣書而爲「七略」。劉氏校書的方法是相當精密的，大約可分幾點：（一）根據許多版本，互相對勘，錯誤則改正，遺漏則補充，重複則刪除；（二）古書多沒有載篇名書名的，他們按照內容替它分篇，加篇名書名；（三）寫內容提要及介紹批評的文字，並敘述學術源流派別等。後來唐朝陸德明，宋朝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對校讎學都有成績表現，周彭校刻「文苑英華」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實。

清代樸學盛時，校讎學成了一個重要部門，包含考訂文字及事實，輯補佚文等工作在內，重要的成績表現，有顧炎武的「九經誤字」，齊召南的「注疏考證」，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刊記」，王引之的「經義述聞」，俞樾的「羣經平議

「諸子平議」等，這些書都是由校書所得的材料編成的。此外，以校讎著名的還有戴震、盧文弨、丁杰、顧千里（廣圻）等，連上面那些人共計，有三十一人之多。

三八 章句之學

「章」的本義就是樂曲的末段，引申之，則凡文字意義已經完足的，也可叫做章。「句」的原義就是在文字可停頓處，用鈎狀記號以作識別的意思。「說文」上有「ㄚ」「·」「兩」字，都是古人點句的符號。所謂章句之學，最初當係指分段落、加標點的兩件事說的。但因古書相傳久了，不是單用符號所能指明，甚或在傳寫時把符號省掉了，應分行的，也因省地位而不分，就更弄不清楚了，於是又不得不附加說明，因此章句之學的內容，又類似傳注了。西漢時不獨經書有某家某家的章句，就是法律也有某家某家的章句。但當時章句之學，流於繁瑣傳會，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故有章句鄙儒的稱號。因而章句與訓詁有分別

，訓詁乃解古今語以通大義，不貴煩瑣

古書因傳寫將章句弄錯的很多，如將前後簡顛倒，遺漏，注釋混入正文等。作注解的也常常將章句弄錯，或將應屬下文的連在上文，或將應當讀斷的地方連讀下去。例如「論語」：「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字應屬上。「孟子」：「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焉字作「於是」解，應屬下。朱子注「大學」「中庸」，稱「朱熹章句」，即因爲他曾依自己的主張把段落句讀重新分過，沒有依漢儒的原本。

標點符號失傳以後的古書，行文上多能注意用文字代符號，如用「曰」字「所謂」字代引號（兩人對話則省曰字），用「云云」代刪節號等。後世公文爲求更加精密起見，用「令開」「等因」當引號。但用文字總不如用標點的明顯，精密。今後整理古書的章句之學，必採用標點符號。

目錄學原本是校讎學的一部分，以後才能獨立起來。章實齋「校讎通義」認爲目錄不過是校讎的結果，沒有獨立成爲一科的價值，但圖書編目，包含書籍分類標準問題，次序排列問題，不是深通學術源流及修學程序的，便不能適當地解決，以便利學者的參考，這類具有指導意義的目錄編制，自應成爲一種專科。

我國目錄學的創始者是劉歆。劉歆將羣書分成六類，每類作一說明，然後將書目排列，稱爲一略，並於六略之外，另編提要一種，名叫「輯略」，總起來稱爲「七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以劉氏「七略」爲藍本，也分成六類，每類作了一個說明，無異於一篇學術源流考。

這種於書名、卷數、著者的記載之外另加圖書內容說明或提要的體例，成了後來歷代編書目的模範。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卽有書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類有總說明，每書有提要。

「漢書藝文志」對古籍作了系統的介紹，爲研究國學者必須參考的書，（因

爲國學菁華全在周秦古籍裏面，後世陳陳相因，很少新的創作。現有的單行本可讀。如果要略略知道漢以後的書，可翻閱「四庫全書書目提要」各類的說明文字（另有四庫簡明目錄，冊數較少）。國學書太多，精采的很少，我們沒有博覽羣書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讀目錄提要，是最好的辦法。

清末張之洞著「書目答問」，就他所認爲較重要的國學典籍，介紹了二千餘種。胡適之梁任公也曾各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都是給初學者用的。張氏所開的書太多，胡梁兩氏所開的書雖不多，但胡氏偏於文學，梁氏偏於史書，亦不甚合適。近年來編這種書目的還有李笠、錢基博、丁福保諸氏以及浙江省立圖書館等。

四〇 圖書分類法

我國圖書的主要類別，在劉歆班固時代，是六分法；自隋唐以至清，大致可說都是四分法。劉班二氏分羣書爲六藝、諸子、兵家、詩賦、術數、方技六大類

。荀勗改分爲甲乙丙丁四部，「隋書經籍志」也分四部，並確定經、史、子、集的名稱。清修「四庫全書」，就是分羣書爲經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類。我國目錄學家認爲圖書分類可以表示學術源流，我們試就六大類變爲四大類的這一點來看一看學術變遷大勢吧。

劉班六大類的子目：（一）六藝，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目；（二）諸子，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以上九家稱九流）、小說家等目；（三）詩賦；（四）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等目；（五）術數，分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等目；（六）方技，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等目。

劉班這個分類，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方六藝，本來以古代官書爲限，不應將論語、孝經（這應入子部儒家）列入，小學也應列爲諸子的一家。諸子中的雜家不能算家，小說和近代文學的小說不同，大約只是一些沒有形成系統的筆記之類

，也沒有成家。兵家應該列爲諸子的一家。陰陽家包含科學與宗教迷信，應該和術數、方技合爲一大類，而分天文、方技（方技一類全屬醫學）卜筮及其他子目。

但從劉氏當時與其同事分工校書的情形看來，他那種分類不過是爲了分工的方便，較少學術的意義。如果照我們修正的辦法，就應分成六藝（即歷史）、諸子（即哲學社會科學）、詩賦（即文學）、陰陽或五行（即科學）四大類。但後來事實上的四大類，却又不是這樣分的。原來的「六藝」分成了「經」「史」兩大類。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因爲尊重六藝爲經，又有許多經師作注疏，六藝就改稱爲經部，且仍居第一位；又因爲史書逐漸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後面了，於是就另闢了史部。原來的「兵家」「術數」「方技」都併入了子部。原來的「詩賦」改稱集部，內容擴大了很多，包括古文駢文詞曲之類。四部之中，只有子部包含有價值的內容，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應用技術等科，完全屬於子部，但子部的書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這實在表現了中國學術的退步。同時

編目人主觀上也懷抱着士大夫輕視儒家以外各家學術的心理，如「四庫全書凡例」就說：「以闡聖學明王道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所以科學、藝術都沒有獨立作爲一部，甚至把墨家名家等類名取消，一律歸入雜家。

現代圖書編目，因爲要用號碼，所以用十分法，主要類名及號碼如左：

0	—	總	類	1	—	哲	學	2	—	宗	教	3	—	社	會	科	學		
4	—	語	文	5	—	自	然	科	學	6	—	應	用	技	術	7	—	藝	術
8	—	文	學	9	—	史	地												

如各大類之下再分小類，小類之下再分子目，則將號碼增加位數，通常爲三位，除類碼外，還有著者號碼附在下面。插架時按號碼排列，尋找起來就不困難。同時現在圖書分類也符合學術上的類別。

從前各圖書館，新書及外國書都用新分類法，編號碼，舊書則沿用四庫全書的分類法，並不編號碼，自從王雲五氏發起中外圖書統一編目以來，過去經史子

集的分類已經打破，各種舊書都按照性質歸入新的類屬了。例如經部的「易經」、「四書」歸入哲學，「詩經」歸入文學，「三禮」、「尚書」、「春秋」都歸入史地，「小學」歸入語文。子部中的藝術，歸入藝術類，術數、釋家歸入宗教類，道家一部分入哲學，一部分入宗教，雜家按其性質分別歸入哲學等類，天文算法歸入自然科學，法家兵家歸入社會科學、醫家、農家，歸入應用技術。至於子部中的類書及史部中的目錄，則歸入總類。子部中的小說及集部諸書歸入文學。這個目錄編制法，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就是糾正了把國學與現代學術對立的觀念，使大家知道中外學術是可以溝通的。

四一 輯佚及生辨偽

輯佚及辨偽是校讎學裏面兩個重要貢獻。所謂輯佚就是將已經失傳的古書恢復起來的工作，所用方法是從許多別的書裏面將引用的文字一點一滴地摘抄出來，再加以整理編輯。這樣輯成的本子雖然不能和原書密合，但至少可恢復原書的

一部分。從事輯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朝的王應麟、陶宗儀、祈承燦、清朝的馬國翰、黃奭、洪頤煊等。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經部四百五十三種，史部八種，子部一百七十三種。黃奭的「逸書考」（一稱漢學堂叢書），經解一百一十二種，緯書七十二種，子史八十四種，又「通德堂經解」十七種。洪頤煊的「經典集林」，內佚書三十六種。嚴可均輯刻「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輯佚書對於清末今文學派的興起，大有幫助；因為久已失傳的「三家詩」等今文家著作，已有了輯佚本。

辨僞是辨別古書中僞託的作品。有些古書全部係後人僞託的，例如「僞古文尚書」（參看第四六節）；有些古書是經後人參了一部分文字進去或修改過的，例如「四書」、「史記」（司馬遷在揚雄以前，竟說及揚雄）。經部僞書還有「孔安國尚書傳」，「鄭玄孝經注」，「孫奭孟子疏」（晉人作）以及「漢魏叢書」中的「子貢詩傳」等。史部有「越絕書」（漢人託名子貢作）「飛燕外傳」，

「漢武內傳」(宋人作，列入漢魏叢書)，通行本「竹書紀年」(明人作，王國維另有古本竹書紀年輯佚本)等。子部有「吳子」「文子」「列子」(均兩晉六朝人作)等。辨偽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實、文字時代性的辨別，其次是別的典籍的旁證，篇章語句的分析等。關於辨偽書的名著，首推清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所提證據達一百二十八條之多。清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則羅列各種僞書，可資學者參考。近人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主要論點是，秦焚書沒有燒六經，西漢經書都是足本；孔子時所用的篆字，秦漢時也用，當時字體沒有今古文的分別；所有古文經傳，全係劉歆一手僞造。近今一般學者多認爲康氏的考據含有成見，全憑主觀，不大可靠。最近學者又主張辨秦前之僞，如戰國時人託名虞夏時人而作「帝典」「禹貢」等，也當辨明。

四二 類書及叢書

類書是和辭典相類似的工具書，編制方法是把各種學術的材料薈萃在一書之

內，按性質分門別類，或按照標題文字的筆畫或聲韻，依次排列，以便檢索。過去有若干失傳的書，幸賴某些類書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段的內容，因此有一些類書更增加了它們的重要性。宋以前類書流傳後世而可考見古籍佚文者有三種。（一）「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二）「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奉敕撰。（三）「太平御覽」一千卷，分五十五門，宋李昉等奉敕撰，成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引秦漢以來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這些書到清朝存不了十分之一二了。明成祖時敕修的「永樂大典」係清「四庫全書」的藍本，（四庫全書另一部分的來源是抄錄或購買民間的藏書），從其體例看，也是類書，它將每種書全文割裂，分韻排列，例如易經先列「蒙」卦，詩經先列「大東」篇，周禮先列「冬官」之頭，其中所探古書善本，也有後世不復流傳的。清康熙時所編「古今圖書集成」也是類書體裁，其引用古書，多不能盡載全文，即因受類目的限制。又康熙敕撰之「佩文韻府」，是分韻排列的類書之一。

叢書是將多種書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書全文貫串，不加割裂顛倒及刪削，便於閱讀。這與給人檢查的類書不同。叢書也有保存古書的作用，因為有些書卷帙很小，單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編入叢書，才能夠流傳久遠。唐宋人所謂叢書，實際上多是文集或筆記，只有宋代左圭所輯「百川學海」是有名的一部叢書。一般的叢書，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數叢書，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種叢書，張之洞「書目答問」中舉出五十七部，是他認為保存了古書，有關經史實學，且校刊精當的，例如「漢魏叢書」（明人刻，收漢魏間著作七十六種，清重刻，增至九十六種）「清武英殿聚珍板叢書」（收書百十八種以上）「玉函山房叢書」（見前，輯佚書八百餘種）「津逮祕書」（明毛晉刻），「學海堂經解」（即「皇清經解」，阮元編刊）「粵雅堂叢書」（伍崇曜刻），「平津館叢書」（孫星衍刻）等。第二種叢書，張氏也舉出五十部與考訂經史有關的，如「亭林遺書」「船山遺書」「東壁遺書」（崔述作）之類。中國古籍過去流傳日本而

本國反失傳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楊守敬從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爲「古逸叢書」。又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叢書」，其中都是中國所已失傳的書。

就「四庫全書」的體例看，也是一部叢書，不過特別龐大而已。（這部書也沒有包括當時全國一切的書，如「佛經」及「道藏」即大部沒有收入，其他有觸忌諱或認爲無用處的亦不收或僅存目錄。阮元編有「四庫未收書目」）這部書總編纂人是紀昀，分編纂戴震、邵晉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萬六千冊。抄寫員一千五百人，經九年後抄成七部。分存北京（兩部）、奉天、熱河、揚州、鎮江、杭州等處。民國九年贈與德國一部，太平軍戰爭時毀去兩部，英法聯軍之戰毀去一部。

「道藏」也是一部叢書，乃道家諸書的總刻，其中所收，除儒家書「易經」等外，其他周秦諸子也多收入，且多係古本，清代學者多根據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書。

四三 考證學與讀書法

考證學的發生，原來是爲了解釋古書，包括文字的訓詁，錯誤的更正，及古代史實的尋繹等。在古書中，尤以經書爲主，所以解經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經證經，（二）以史證經，（三）以子證經，（四）以漢人文賦證經，（五）以說文解字證經，（六）以漢碑證經等。因證經而引起子、史羣書的研究，考證的範圍就日益擴大。考證學對於書籍本身的貢獻，就是校讎、辨僞、輯佚等事。考證學範圍雖大，簡單說來，就是把一大堆斷爛材料，一點一滴地從多方面下整理工夫。考證學者的讀書方法，總是把許多書互相比較對勘，可以說他們讀書同時就是校書，他們的著作就是校書的報告，正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說，「獨處一室，覃精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彝器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

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蹟之實也」。專門考證的事業，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做，但對於專門家考證的成果，却應當知道去利用；同時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也可以採用他們的比較讀法。

第五章 經學

四四 五經、十三經、四書

漢朝人尊重儒家古典著作稱爲經書，解「經」字意義爲常道，相沿到現在。其實「經」的原意就是線，所謂經書就是線裝書，古代記事書於竹簡，事多一簡不能盡，便連續記在數簡上，其連繫各簡的線，就稱爲「經」，可見經不過是當時記載頁數較多而又常須翻閱的書罷了，並沒有其他的深意。

六經的名稱，首先曾在「莊子」中發現。「莊子」及「禮記經解篇」都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經。班固「漢書藝文志」稱爲六藝。但因「樂經」散失，只存「樂記」一篇，併入「禮經」中，於是有了「五經」的名目。到唐朝時候，「春秋」按照「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分成三種，「禮經」也分爲「周禮」、「儀禮」、「戴禮」（禮記）三種，立「三傳」「三禮」的稱號，配合「易」、「書」、「詩」，稱爲「九經」。再到宋朝，把「爾雅」、「孝經」、「論語」、「孟子」四種加上，便叫作「十三經」。宋儒朱熹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印單行本，和「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給它們作詳細注釋，奉爲儒家古典的菁華，於是科舉考試，必根據「四書」出題，而「論」、「孟」、「學」、「庸」便成爲小學生必讀書了。

班固「藝文志」將儒家列入諸子，而把六經作爲六藝，列在諸子之前，其用意是認爲六經是古代官書，非儒家所能私有，而且六經是諸子百家的學術淵源，班志說得很明白。不過班氏將「論語」「孝經」列在六藝的末尾，卽有特別尊重孔門本身著作的表示。總之，「易」、「詩」、「書」、「春秋」、「禮記」，如果依古文派經學家說，就並不是孔氏的私家著作，這個觀點是一般有識見的學者

應該承認的。

清章學誠（實齋）在「文史通義」上明白指出「六經皆史也」。古人已經說過「尚書」爲記言之史，「春秋」爲紀事之史，至於「三禮」，記載古時禮儀官制，則明明係制度史，「詩經」國風爲風俗史，雅頌則包含社會變革的許多故事傳說，「易經」是卜筮之書，可算是宗教史思想史材料，其中類乎神籤的文字也包含了傳說故事，所以全部都是史料。

現在經書最完備的通行本是清朝阮元所刻的「十三經注疏」，卷帙很繁。除去注疏專印正文的有商務館的「十三經白文」一厚冊，頗便翻閱。以下把各種經書內容說說。

四五 易經

「易經」是按照六十四卦的次序編排的，從乾卦開始，到未濟卦結束。書末附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幾種總的說明文字。每個卦都有符號表

示，是用陽爻「—」陰爻「--」做基礎來配合的。配合的方法，第一步是三爻相重而成☰☷☱☲☳☴☶☵☸，即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第二步再將這八卦，每兩卦相重而成☰☰（乾）☷☷（訟）……等六十四卦。每卦有一個總的說明，叫「卦辭」，每爻各有一個說明，叫「爻辭」。此外，每卦還附有一象（去爻乃）辭」和「象辭」兩種文字，乾坤兩卦還附了一種，叫「文言」。卦辭，爻辭是「經」的部分，其餘文字連書末的在內，都屬於「傳」（「傳」的本義是比經短一點的書本，但通行意義是對於經義有所發揮的補充文字，所謂聖經賢傳，各有專名——這是今文派經學家的主張）。易傳七種，象、象、繫各分上下篇，與說卦、序卦、雜卦、文言合稱十翼。相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其他還有種種的說法，也不知究竟是那些人作的。

易經包含哲學的道理，簡單地說，即從前人們所謂易有「簡易」，「變易」及「不易」的三個意義。因為認定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個規律，不外始、中、終

三相之轉移，所以能以簡馭繁，這就是「簡易」。易經認為萬事萬物無時不在變化流轉中，如它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說「小往大來，大往小來」，又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而各種不同的卦，不同的爻，又都是表示各種吉凶消長的複雜情狀的，這就是「變易」。但另一方面，它認為變化只是在一個不變的範圍裏面之循環往復，如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不會發現進化的觀念，這就是「不易」。

易經的文字和思想都相當地結構完整，郭沫若氏最近懷疑它不是周初的作品而是戰國時候的。是否如此，還待考證。

四六 書經

書經一稱尚書，「尚者上也」，有人說是「上古的書」的意思，有人說是「上帝書」的意思。現通行本包括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一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三十三篇，如「堯典」，「禹貢」，「盤庚」，「洪

「範」等，稱「今文尚書」，同時又是「古文尚書」，其餘都是「僞古文」。所謂今古文的分別，是這樣的：漢朝初年，伏生傳授尚書二十九篇，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出，稱爲「今文尚書」。後來漢武帝末年在孔子宅牆壁中發現一部用古體字寫的尚書，相傳共十六篇，稱「古文尚書」。不過這部古文尚書不久又失傳了，到東晉時候，有一個梅賾（或作梅頤），向朝廷呈獻「古文尚書」二十五篇，附「尚書傳」一篇，說是孔安國作的，於是人們都相信古文尚書是失而復得，但清朝閻若璩氏等考證的結果，斷定這部書是晉朝人王肅或皇甫謐或就是梅賾僞造的。現在通行本是今古文合編，篇數有分有合，和原來的不符。

尚書包含的史實，上自堯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年代最早的「堯典」「舜典」「皋陶謨」「禹貢」等篇，過去一般人老實以爲是虞夏時代的文章文，近代學者已證明這部分真的尚書也是儒家的僞託，不過著作年代還在周朝，比東晉人的僞尚書更有價值些。因爲雖是僞託，也必有所依據，而時代較早的著作，所依

據的傳說，真實性必較多。尙書篇名，多用典、謨、訓、誥等字煞尾，正和現在的宣言、布告、會議錄、講演集一類的文章相彷彿，所以被稱爲記言之史。其中有「洪範」一篇，代表原始的哲學思想，以水火金木土五行爲世界萬有的基本原素，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等關於政治的原理原則，統名「九疇」，頗爲儒家所重視。

四七 詩經

詩經是一部樂歌，分「風」「雅」「頌」三部分。風大半是民歌，分十五國，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敘事詩爲多。頌分「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多敘事詩與祀神歌。總計三百〇五篇。相傳詩的原有篇數在三千以上，經孔子刪削而存此數，但「論語」卽有「詩三百」的話，恐孔子未必刪削過。現存的詩經爲「毛詩」，漢朝傳授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那三家都失了傳，現在毛詩是所謂大毛公者傳授的。詩經附有「

詩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詩的前面，是說明詩中大意的，大序是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總論全書的。詩序的作者問題，沒有定論。詩的來源據是定期採集而來的，古時有采詩之官，每年八月乘輜軒，周遊國中，采是歌謠，陳於天子；又天子巡狩各國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當時採集的區域，以黃河為中心，十五國風不過是今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幾省裏面的，所以詩經是北方文學。但「周南」「召南」的背景却在江漢一帶。詩的修辭方法有所謂賦、比、興三種：賦是直接敘述，比即完全譬喻；興是先寫背景而後明白敘述。詩有所謂六義，就是風、雅、頌、賦、比、興。

詩經是一部可靠的古書，沒有發生真偽問題，但詩序就不大可靠，它對於詩的內容每加曲解。詩經不但有文學價值，同時也是史料，例如「商頌玄鳥」篇，敘述簡狄吞鳥卵而生契的傳說，「大雅·生民」篇，敘述姜嫄踐踏上帝的足跡而生后稷的故事，暗示着遠古社會的情形；「豳風·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

茨」、「南山」、「甫田」、「大田」諸篇，敘述周民族農業的興盛；至於平王東遷以後，社會鬥爭逐漸尖銳，則有所謂「變風」「變雅」（這是解詩者給予一部分風、雅詩篇的名稱）來抒寫抑鬱憤慨的感情，如「邶風」的「北門」，「王風」的「黍稷」，「唐風」的「鶉羽」，「秦風」的「黃鳥」，「小雅」的「節南山」、「正月繁霜」，「大雅」的「板」、「蕩」、「桑柔」、「雲漢」諸篇，都是怨天恨人之作，而「小雅」的「何草不黃」、「北山」、「出車」、「采芣」、「黃鳥」，「魏風」的「葛屨」、「伐檀」、「碩鼠」諸篇，尤其露骨地表現社會的不安。

四八 三禮

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現在五經中就只有「禮記」。但古時所謂禮經十七篇，却是專指「儀禮」，「禮記」不過是孔門弟子附在禮經後面的筆記。現在的「禮記」或稱「戴記」，或稱「小戴禮」，它原是漢朝初年河間

獻王從民間抄來獻給朝廷的，後來劉向校閱政府藏書，又發現幾種，合起來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加以刪節，爲八十五篇，稱「大戴記」（大戴記現有殘本，不在十三經以內），戴聖再刪爲四十篇，稱「小戴記」，馬融又增編幾篇進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是現在的「禮記」。「周禮」也是河間獻王抄來的，其中篇目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割的，缺冬官一篇，有人找一篇「考工記」來補足它，後來劉歆校理羣書，才將這部書編入經籍，叫作「周官經」。這部書，早已有人懷疑它不是古本，但劉歆鄭玄相信它確係周公所作。從它的內容看，大約是戰國時人，根據戰國以前的行政制度寫成的。儀禮原有兩種本子，一種是漢高堂生所傳，是今文，一種從孔宅壁中得來，是古文，東漢鄭玄合併兩種本子，就是現在流傳的「儀禮」。儀禮據古文派經生說，也是周公所作。

「儀禮」的內容是冠、昏、喪、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禮的詳細儀式，讀了可以明白封建貴族的繁文縟節，可以考見古代宮室、舟車、衣服、飲食等日常

生活的情形，以及宗教信仰，親族制度，政治組織，外交方式等。「周禮」是儒家理想的官制，也包含了古代事實上的制度。所謂六官，是天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好像現在行政院長一樣。地官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好像教育部兼財政部一樣。春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這是一個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要佔一大部分，所以特設一個大官來辦理。夏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這是陸軍部。秋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就是司法部。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這是農工部。禮記的王制篇，也講官制，和周禮大致差不多。我國歷代官制，多半參考這種辦法，滿清政府的吏（管民政）、戶（管財政）、禮（管祭祀及科舉）、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禮記」一書，對於風俗禮制方面，說得最多，也有理論文字，要研究封建時代的宗法制度和舊禮教，這是必讀的書，如「內則」篇給婦女規定的行為標準，「少儀」篇給青年子弟規定的行為標準，直到近來，還對我國社會發生很大的支配作用。「禮記

「中間有些精采的文字，如「學記」篇的論教育，「樂記」篇的論音樂，「儒行」篇的論修養，「禮運」篇的論政治，現代人都非常贊美，時常引用。但我們須知這部書是漢朝人整理過或編寫成的。

又「禮記」中「大學」，「中庸」二篇，現已列入「四書」。「大學」相傳為曾子所作，其中所記有所謂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有所謂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清朝人陳乾初懷疑「大學」不是孔門的書，著有專文論證。「中庸」相傳是子思所作，其中談天命、性、道，是宋儒理學重要根據之一。

四九 春秋

「春秋」是魯國史書，孔子加以修改，於記載文字中暗寓褒貶的意思，好像現在編報紙的寫新聞標題一樣，孟子曾讚美它的宣傳力量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文體好像現在的大事記，按年月次序作簡單的記載，是後

世編年史的開端。所敘事實，起於魯隱公，終於哀公，經過十二君，凡二百四十二年。爲「春秋」作傳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左傳」記載史事頗詳明，「公」「穀」兩傳是解釋經文文字意義，推闡其所暗示的微言大義的，現在通行五經本的春秋，就只附有「左傳」，沒有「公」「穀」。「公羊傳」屬於今文學，「左傳」爲古文學，「穀梁」原屬今文，近人崔適指斥他也是劉歆僞造，於是也屬於古文學。左丘明另著「國語」一書，也是敘當時史事，人們叫它做「春秋外傳」。春秋大義，一般人認爲最主要的是（一）尊王，（二）攘夷。表示這些大義的「書法」，以正名定分爲原則。但今文派經學家所謂微言大義遠不只這一點，他們以孔子爲「素王」，藉口誅筆伐代行帝王的權力。公羊學則注重春秋的三世，卽由據亂世進到升平世，再進到太平世，頗有進化的觀念，但此三世原係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成三個階段而說的。

「論語」是孔子的語錄及日常生活的紀錄，並有當時孔子弟子的談話參雜在內，據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死後，門人互相討論編輯而成，所以稱爲「論語」。「論語」分三種：（一）「古論語」，出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二）「齊論語」，乃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三）「魯論語」，乃魯人所傳，即現行「論語」所根據的本子，凡二十篇。「論語」所談，關於道德修養政治學術各方面，言簡而旨遠，文字多半饒有風趣。「孝經」內容不大精彩，分「開宗明義」等十八章，古時以爲是孔子所作，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則以爲是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說之，門弟子筆記而編成的書。「孝經」有今古文的分別，秦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的兒子顏貞獻出，凡十八篇，就是「今文孝經」。「古文孝經」出自孔壁，二十二篇，南朝梁時已失傳，後來獲得的本子都是僞作。現在「十三經注疏」中的「孝經」，爲唐玄宗所注，所採的本子是今文。至於單行本，多是朱子所編定，將玄宗所定的本子顛倒排列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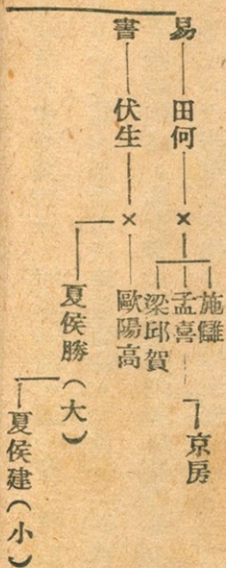
爾雅」是解釋字義的書，前已說過，第一篇「釋詁」，據說是周公所作，「釋言」以下十八篇，是後人陸續增補的。「孟子」是戰國時鄒人孟軻與弟子萬章等自記其言行的作品，凡七篇。孟子學說，如性善論，仁義說，養氣說，先天良心說等，是宋明理學重要根據之一。但漢唐時代，孟子尚列在諸子裏面。

五一 經之傳授

秦始皇併吞六國以後，設博士官（和今日的參議相似）保存並傳習詩書，禁止民間私自講學，後來因博士淳于越議論不合時宜，丞相李斯主張燒百家書，始皇採用他的提議，次年又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因此陳涉起義時，魯諸儒生帶着孔氏的禮器，前往參加。漢高祖初起兵，還看不起儒生，取儒冠以盛便溺，後來天下平定，方才領悟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於是以太牢祀孔，用秦博士叔孫通張蒼釐訂法制。惠帝繼承他，廢除民間挾書的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設博士，但人數不多。到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學術乃定於一尊，設置完備的五經博士，以

通經爲登進人材的標準，於是經之官學，成爲富貴榮顯的捷徑。漢因秦以純法治主義而失敗，所以一反秦的所爲，而崇尚儒家的德治主義來拉攏人心，這就是以利祿提倡經學的由來。所謂經學，和戰國時代的儒學不同，經生不自創學說，而只是從事經書的傳習與注解。所以經學的發展，便是學術思想停滯不進的徵象。

在西漢官學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今文學派，即所謂十四博士（宣帝元帝時）的經學，十四博士是：易經有施、孟、梁丘、京；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經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春秋公羊傳有顏、嚴，共十四家。他們的師承，列簡表如左，其中不著名的人名略去：



詩
 魯詩：申公培
 齊詩：轅固生
 韓詩：韓嬰

春秋

公羊傳

胡毋生

(後漢)何休

董仲舒

嚴彭祖
 顏安樂

穀梁傳 | 瑕丘江公

禮(儀禮) | 高堂生

戴勝

戴德

右表中穀梁未立學官，又，何休不屬於西漢。但現在流傳的今文學派書籍，何休「公羊傳注」很重要。此外伏生的「尚書大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兩種書雖還存在，但還是後人輯本。

西漢末年，古文經傳陸續出現，古文學派因而產生。劉歆繼承父業，校祕府藏書，將「費氏(直)易」，「孔氏(安國)尚書」，「毛詩」，「春秋左傳」

周禮」等古文經傳，一一加以研究整理，古文學於是獲得發展的基礎。近人康有爲氏指斥劉歆僞造古經，幫助王莽。當時王莽以復古名義行新政，劉歆在學術上贊助他，大概是事實，但他不可能一手僞造那許多古經。不過古文派傳授不大可考，我們不得不把劉歆當開派大師看。古文經學雖未能成爲官學，僅流傳民間，但因有服虔、馬融、許慎、鄭玄等大師的努力，勢力漸盛。他們與今文經師不同，都能兼通羣經，把訓詁工作做得切實。鄭玄作「毛詩箋」，注「周禮」「儀禮」「禮記」，兼採今古文經說，雖被認爲混淆家法，但因此卻集了經學的不成，而使今文派消沉下去，並且他注重名物訓詁，開了考證學的先路。古文派現存的書除上述鄭氏數種外，還有許慎的「說文解字」及「五經異義」（後人輯本）。

五二 今文經學與讖緯

今文經學的領袖人物是董仲舒，他研究「公羊春秋」，應用陰陽五行讖緯之說，來解釋儒經，使儒學宗教化，成爲官僚專制政治的思想基礎。在他的著作「

「春秋繁露」中展開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從宇宙談到社會談到人生，一切以陰陽五行爲基礎。他認爲陰陽變化而成四時，五行則是變化所依的時空閒架，此種變化是循環運轉，所以說「天不變，道亦不變」，同時天象通於人事，災異係上天警告人君與宰相的表示，人與天地參，人類歷史也如天運循環，有所謂黑白赤三統的互相交替（參看第六七節），又以爲「天道任陽不任陰」，陽尊而陰卑，所以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 今文學家所應用的讖緯之說是什麼呢？當時有些學者，認爲有經必有緯，於是造作緯書，託名是孔子所作，有「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七種，內容多依託經義，講符籙瑞應。同時又有讖書，大約卽「河圖」九篇，「洛書」九篇那一類的東西。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緯與讖雖有分別，但緯書荒誕部分也和讖書差不多。後經隋煬帝焚禁，現在存留的不是完本。

孔子在春秋戰國之時，本是一大學者，在「公羊春秋」中，由學者進而為素王，到緯讖書中，又由王進而為神。由此可見西漢時代的思想反動的一斑。古文運動是為反對這一形勢而起的。

五三 古今文學派的鬭爭

古文學派與今文學派，從西漢末年一直延到東漢末年，二百餘年間，發生了四次大的鬥爭，表面上或者為了爭官學的地位，或者為了爭書籍的真偽。清朝後半期也發生同樣的鬥爭。如果比較兩派的爭論問題，則可得以下幾個要點：

1. 今文派尊孔子為受天命的素王（素王是未得其位的王），古文派尊孔子為先師；

2. 今文派以孔子為託古改制，古文派以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學家；

3. 今文派以六經為孔子著作，古文派以六經為古代史料；

4. 今文派以「春秋公羊傳」為主要憑藉，古文派以「周禮」為主；

5. 今文派指斥古文經傳是劉歆偽造之作，古文派斥今文經傳是秦火殘缺之餘——今文經傳現存「儀禮」、「公羊」、「穀梁」(?)及「小戴禮記」(?)、「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古文今存「毛詩」、「周禮」、「左傳」；

6. 今文派相信緯書，以爲孔子的微言大義，間有存者，古文派則斥緯書爲虛妄。

由以上幾點看來，兩派不但是所根據的經傳版本不同，而且治學態度也相反。今文派雖斥古文經爲僞，而本身所根據的經也未必是真，尤其是經說完全由主觀造作，發爲種種怪異的議論，傾向於迷信與獨斷。古文派態度比較客觀，注重歷史的根據，不採神祕怪異之說，故其經說比較接近孔學的真相，但未免過於信古。

自漢至清，支配我國思想界的主流，爲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兩漢經學在這一期間等於中斷，這時期中比較可注意的幾點是（一）今文經學的首先衰落；（二）南北學的分化；（三）隋唐義疏之學的興起；（四）宋明理學的影響。

自漢魏間鄭玄王肅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實際左祖古文經學，加以晉永嘉之亂，今文經傳大部分亡失，今文經學就從此衰落下去，而古文經學則相對地日漸開展。在魏晉玄學清談的空氣中，王弼注「易經」，何晏注「論語」，雖不免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大體仍以漢學爲根據。南北朝時，南北經學的傾向頗有不同。最顯著的分歧點，就是南方尊重鄭玄的易注，杜預的左傳注，北方尊重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傳注。南北朝至隋唐間，所謂義疏之學發生，義疏者就漢儒經注再加以疏釋之謂，就是注解的注解。兩者合而言之，叫注疏，分而言之，「注」一類的東西，有傳、記、箋、註、詁訓、解詁、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類的

東西，有義疏和正義。它們的體例是：注不破經，經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稱博引以說明之，但後來清人有些疏也糾正注的錯誤。義疏之學盛於唐，唐初孔穎達賈公彥作五經注疏，爲當時政府規定的經學標準。唐以科舉取士，違反孔賈義疏的就不予取錄。孔氏所採經注以南學爲主，將北學合併到南學裏面，於是王弼服虔之學散失，而唐之義疏風行於世。

宋儒講經，不重視古注，各自發明義理，因研究方法的不同，終於形成了三派：一派以程頤朱熹爲代表，相當地採用歸納法；一派以陸九淵楊簡（慈湖）爲代表，純粹用演繹法；一派爲批評派，以葉適（水心）陳傅良（止齋）爲代表，號稱浙學，此派不空談性理，而注重事功，再分爲金華派（出於呂東萊）永嘉派（出於陳傅良）永康派（出於陳同甫）。宋儒理學雖係根據經書立說，實係自有體系，另詳理學一章。元明兩朝，因朱熹之學爲朝廷提倡，取得正統地位，陸象山之學得王陽明繼續闡揚，也爲當時學者所信仰，他們兩派都是借經學講理學，

本不以經典爲主，降至末流，便將經學書擱置不讀。專門空談，所以經學因而衰落。清代儒生，因矯時弊而反對理學，提倡樸學，學術風氣爲之大變。

五五 清代的經學

清代思潮的變遷可分三期：（一）啓蒙期。特點是對於明末理學的反動，主張匡救時艱的實學，但仍不完全擺脫理學的窠臼，尤其是都以爲必須通經方能救時。開創清學的大師是顧炎武，他研究當時郡國利病，對實際問題有貢獻，同時奠定了考證學的基礎。其他考證的名手有胡渭、閻若璩。重苦行實踐的有顏元李璩；以史學爲根據而注意時事研究的，有黃宗羲萬斯同；專治天文算學，開自然科學之路的有王錫闡梅文鼎。（二）全盛期。特點是對理學不再攻擊，也不因襲它，又不抱通經致用的觀念，完全脫離實際而作書本上的考證，卽爲考證而考證，爲經學而治經學，（以上幾點不適用於戴震）主要人物是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號稱漢學正統派。（三）沒落期。特點是正統派趨於沒落，僅俞樾孫詒

讓等一二大師守最後壁壘，而今文派康有爲等，因晚清時局動盪，乃企圖借經學爲改良時政的工具，於是著「新學僞經考」，抹煞古文經傳，根據公羊，創「孔子託古改制」說，又著「大同書」以表現自己的理想，雖救時的志願可嘉，但其治學態度全憑主觀，對於經學本身並沒有什麼成就，所以這一派也不能發展。

在這三期中的主要學派有四個：（一）浙東學派——黃宗羲（梨洲）創立，萬斯同，毛奇齡等繼之；（二）東吳學派——創自吳江惠氏祖孫三世，卽惠周惕、惠士奇、惠棟（定宇），繼之者有余蕭客、江聲（艮廷）、錢大昕、王鳴盛等；（三）皖南學派——創自婺源江永（慎修），其弟子戴震更光大之，繼之者有胡培翬、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四）常州學派——從武進莊存與開始，繼之者有劉逢祿、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等。

右東吳皖南兩派，都屬於全盛期的考證學派；但吳派揭漢學旗幟，拘守漢人學說，毫無創造精神，皖派巨子戴震，並不自命爲漢學，但使人從漢學以求新發

見，其治學方法根本在「實事求是，無微不至」。所謂樸學，應該以皖派爲中堅。因清之樸學，並不是東漢古文學的再現，而是具有進一步的發展的，在其極盛時期，種種專門學術如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史學、地理學、天算學等，都分途進行，而類書的編纂，叢書的校刊，僞書的辨明，佚書的搜輯以及古書的校勘，也是他們的業績。常州學派頗注意於今文學的研究，爲晚清今文學的先導者，繼之者除康有爲外，還有王闈運、廖平、皮錫瑞，以及近人夏曾佑、崔適。樸學正統，到最後還有章炳麟（太炎），新派有王國維（靜安）羅振玉。繼章氏學者有黃侃（季剛）吳承仕（檢齋）等。

總而言之，清代經學凡三次變化，開始爲漢宋兼採，乾嘉時期，東漢之古學全盛，晚清則西漢今文學再起。在此等變化中，有幾次的理論鬭爭，即（一）漢學和宋學的鬭爭；（二）今古文的鬭爭。江藩著「國朝漢學師承記」，對正統派經學竭力推崇。方東樹著「漢學商兌」，則代表宋學施行反攻。至於今古文的鬭

爭，則從康有爲與章炳麟兩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五六 經學的揚棄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以漢至清爲經學時代，並說在此時代中的思想家，都將新酒裝入五經的舊瓶中，但到清末今文家把近代思想都裝進去時，瓶擴大到破裂的程度，以後不能再裝了，所以經學時代便告結束。這個譬喻相當地適合，但有人說他忽視了質的變化，只看到量的增加。其實所謂新酒是與舊酒有質的差異的，這在向來應用這譬喻者早已不言而喻。不過馮氏的解釋還不夠一點，似乎應該加一句：近代思想好像氫素之類，舊瓶是玻璃質的，自然沒有裝它的可能。總之，經學這個名詞，到了現在，只應該是中國學術史上的，而不應該代表眼前學術的一部門了。因爲五經或十三經的本身，應當作爲古代史的史料處理；西漢今文學、宋學以及晚清的今文學，都只能作爲漢宋及晚清的思想史的內容看；至於東漢經學及清之樸學，則可以認爲古文字學、古史學之一部分。有人說，經書的

內容，有關於理化博物物的，有關於數學的，有關於社會學的……學者應善為研究，其實各種學術都以現代為精，我們決不能捨今從古，經書中的什麼什麼，那都不過是給學術史的一種資料吧了。如果不把它當作史料，而閉着眼睛講通經致用，想引用春秋斷獄，崇半部論語治天下，那就走入了魔道。如果把現代思想或自己意見假託孔孟之名來說出，以六經為我注腳，那更是厚誣古人，欺騙今人。周予同說經學除今古文派宋學派以外，還有一個新史學派（見氏著「羣經概論」），這是他的卓見。可是，如果說這些把經書當史料運用的新史學家就是現代的經學家，則過去所謂經學顯然地已經或正在被新史學所揚棄。同時，因為經書中有一部分是古代的文學作品（詩經），有一部分是古代哲學（易經、四書等），這些史料又當為研究中國文學或哲學者的研究對象，這是不必再加討論的。

第六章 史地

五七 所謂正史

從前學者對歷史研究也頗注重，史的地位僅次於經。史部典籍繁多，最佔重要地位的就是所謂正史。正史是官修的，每逢朝代更易，新朝政府便簡派一批人（但從前並不一定是這樣的），編撰上一代的全史，累積到清朝，這樣的史書就有二十四種之多，叫做「廿四史」，茲將二十四史的書名作者列左：

- | | | | |
|--------|-------|-------|-------|
| 1. 史記 | 漢司馬遷撰 | 5. 晉書 | 唐房喬等撰 |
| 2. 漢書 | 東漢班固撰 | 6. 宋書 | 梁沈約撰 |
| 3. 後漢書 | 宋范曄撰 | 7. 齊書 | 梁蕭子顯撰 |
| 4. 三國志 | 晉陳壽撰 | 8. 梁書 | 唐姚思廉撰 |

- | | | | |
|--------|--------|---------|--------|
| 9. 陳書 | 唐姚思廉撰 | 17 新唐書 | 宋歐陽修等撰 |
| 10 魏書 | 北齊魏收撰 | 18 舊五代史 | 宋薛居正撰 |
| 11 北齊書 | 唐李百藥撰 | 19 新五代史 | 宋歐陽修撰 |
| 12 周書 | 唐令狐德棻撰 | 20 宋史 | 元托克托等撰 |
| 13 隋書 | 唐魏徵等撰 | 21 遼史 | 元托克托撰 |
| 14 南史 | 唐李延壽撰 | 22 金史 | 元托克托撰 |
| 15 北史 | 唐李延壽撰 | 23 元史 | 明宋濂等撰 |
| 16 舊唐書 | 石晉劉昫等撰 | 24 明史 | 清張廷玉等撰 |

以上「廿四史」至明代止，共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清朝雖已過去，但官修的正史還沒有完成。民國初年本來設有清史館，由趙爾巽等主持其事，到民國十七年，編成了一部未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錄五卷，命名「清史稿」，曾草草付印，不久即被禁。開明書店印行「廿五史」，係將柯劭忞所撰「新元史」加入

。「新元史」於民國九年脫稿，經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內容比「元史」正確詳備。又，「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爲廿四史中最被人重視的一部分，過去讀史者，廿四史不必全讀，但這四史則在所必讀，尤其是「史記」、「漢書」、文章優美，不僅被人當史書讀，也當文學作品讀。就正史體例說，司馬遷創立之，班固繼承之，略加更改，以後作史者完全依樣畫葫蘆，沒有新形式，我們只須分析一下「史記」「漢書」，便知道一切正史了。

五八 正史的內容

正史不一定正確，但比較地詳備，爲研究史學者的主要材料。「史記」是最早的一部完備的史書，在他以前的重要史籍，有「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竹書紀年」等。這些書，司馬遷大概都參考過，只有「竹書紀年」敘事多與「史記」不合，恐怕司馬不曾見過。「世本」內有「帝系」「世家」「傳」等，大約就是「史記」體例的藍本。首創史例的司馬遷，編撰「史記

「一書，是以人物做歷史的中心，作十二「紀」以敘帝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共計一百十二篇傳記，形成全書的主要部分，此外有「平準書」、「河渠書」、「封禪書」等八「書」以紀政事，十個「年表」以貫歲月。「漢書」體例也差不多，只有「書」改稱「志」，如「藝文志」、「律曆志」、「食貨志」等。又去「世家」名目，收入「列傳」。「漢書」與「史記」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史記」的性質是通史，而「漢書」則為斷代史。「史記」包含的年代，上起黃帝堯舜，下至漢武帝，「漢書」則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亡。自「漢書」以後，所有正史都是斷代史，只南北朝時的一段，除各代分撰者外，還有通敘各代的「南史」「北史」。又「五代史」因年代短促，也沒有再分。各書內容，差不多都仿「漢書」的形式編制。

正史雖是整理史料而編寫的史書，但從現代觀點看，仍不過一堆史料。讀正史的方法，以分別選讀為好。如要看政治上大事，當讀「帝紀」，參以有關人物

的傳記。如要知道一代的典章文物，當讀「志」或「書」。例如研究經濟史，須讀「平準書」「食貨志」類的史篇。研究學術史，當讀「藝文志」「經籍志」等，參以「儒林傳」「道學傳」之類的傳記。

五九 編年史

編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與紀傳表志體不同。最早的編年史本應算「春秋」，「左傳」，但因其被稱爲經，於是第一部編年史便輪到東漢荀悅所作的「漢紀」，這書就是模仿春秋左傳的體裁的。編年史最著名的是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這部書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重要史事，作者選材的主旨，專取「有關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經驗教訓可資學習者」，宋神宗因其可作政治的參考資料，賜名「資治通鑑」。其他屬於編年史的史書有「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九朝編年備要」「西漢年紀」「靖康要錄」「兩朝綱目備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續編」等，而朱熹所編的「通鑑綱目」尤爲著

名，與「資治通鑑」合稱「兩通鑑」。明清時人根據它們而編的簡單歷代史，名叫「綱鑑」如袁了凡王鳳洲所編之「綱鑑」及「綱鑑易知錄」等。又清乾隆敕撰的「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及清畢沅的「續資治通鑑」也頗重要。

六〇 紀事本末

紀事本末體的史書亦稱類史，創自宋朝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它不以人為中心，而以事為中心，分類排纂，每篇敘述一件史事，窮源竟委，前後分明，易於通曉。但缺乏史事間之橫的連繫。宋時仿袁氏體例的史書還有章冲的「左傳事類始末」及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明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撰「左傳紀事本末」，與袁氏書合稱「五紀事本末」。清魏源「聖武記」（記清代軍事），馬驥「釋史」（記上古至周末事），亦頗重要。

別史是私家著作而體例和正史相類似的，如宋鄭漁仲（樵）「通志」一書，有本紀，世家，列傳等篇，儼然正史一樣，所以史部分類，將它列入別史。其實「通志」的特點乃在於敘述歷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應當屬於過去史部分目中的「政書」一類，與「通典」「通考」相聯繫，而在現在的分類，則當屬之文化史或制度史。清蔣良騏所撰的「東華錄」，述清初史事，起天命至雍正凡六朝，亦是別史中的名著，後來王先謙將其內容擴大，並續編乾隆以下五朝，至同治止，稱「十一朝東華錄」。

「通志」一書，紀傳由上古敘至隋止，禮樂政刑之類，則敘至唐止。其中列傳，全仿史漢的分類的形式，而不採取個人的標題，其分類有后妃、宗室、外戚、忠義、孝友、義行、獨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隱逸、宦者、游俠、刺客、滑稽、貨殖、藝術、佞幸、列女、載記、四夷等。

「通志」二十略的名稱是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法

、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其中氏族、六書、七音、謚法、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諸略，是鄭氏創造的門類，不是前史所有，尤其值得注意。

清乾隆時又仿鄭氏通志敕纂「續通志」及「皇朝通志」兩書。「續通志」紀傳從唐起，諸略自五代起，列傳中增加孔氏後裔，貳臣、姦臣、叛臣、逆臣等傳，而刪併游俠、刺客、滑稽、貨殖等。二十略則內容多有增補。「皇朝通志」二十略名稱依舊，但將內容增減，紀傳年譜則從省。

六二 政書

紀述制度文物之沿革的史書，在過去史部子目中，稱為政書。創造這種史書的是唐朝的杜佑，杜氏搜集上古以至唐肅宗代宗時的材料，參考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等書，分八類編纂，成「通典」一書。其八類次序是（1）食貨，（2）選舉，（3）職官，（4）禮，（5）樂，（6）刑，（7）州郡，（8）

邊防。他自敘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說是獨具卓識。

清乾隆敕撰「續通典」，自唐肅宗至德元年，至明崇禎末年止，九百七十八年間的典章制度，頗能扼要敘述，又「皇朝通典」一部，記清朝制度。兩書都依杜氏篇目，但刑典中析出兵典一種。

繼杜佑通典而更加詳備的同類著作，應推元馬貴與（端臨）的「文獻通考」。馬氏自序中說：「門分類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雖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馬氏書，乾隆時也有續編。一爲「續文獻通考」，敘宋遼金元明五代事迹，於馬書郊社、宗廟內分出羣祀、羣廟，擴充到二十六門，內容有比馬書詳密處。一爲「皇朝文獻通考」，記載頗詳，卷帙與馬氏書差不多。

以上杜氏「通典」，馬氏「通考」，與鄭樵「通志」，合稱「三通」，再加以清乾隆勅撰的續編六種，則稱爲「九通」。從前有一句話說：秀才不讀九通，還只算不通。可見人們對這幾部書的重視。三通內容雖不免重複，但亦各有其特點。「通典」簡單扼要，「通考」詳明周密，「通志」則別有剪裁，精於考訂，其細微節目，有爲前兩種所不具備的。所以三種書同時流行。現在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術史等專史，當以它們爲重要資料。

六三 雜史傳記及其他

雜史是不以中央政權爲綱領的史書，體裁和正史不相類似，但內容仍有體系，可與正史相參證。例如「國語」敘春秋時事，是分國敘述的，「戰國策」講戰

國時縱橫捭闔的活動，也是分國敘述的。這兩書是司馬遷作「史記」的重要參考書之一部分。傳記是指「孔子編年」，「朱子年譜」，「名臣言行錄」那一類的書，清李元度所著的「國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是清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他史書，有所謂「載記」者，如「吳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鮮志略」等便是。有所謂「史抄」者，如「兩漢博聞」，「通鑑總類」等便是。有所謂「職官」者，如「歷代職官表」，「百官箴」等是。有所謂「時令」者，如「歲時廣記」是。有所謂「詔令奏議」者，如「兩漢詔令」，「歷代名臣奏議」等是。這些書是次要的史料，在專門研究者是可以擇要參考的。至於所謂稗官野史，大概是指私人筆記，記述掌故軼聞，可以補官書之缺，糾正官書之錯誤的，例如太平天國失敗，它的本身記載，完全被滿清消滅，只民間有些零星筆記，保存其一部分真相。這類的野史，倒是可寶貴的資料。前代野史，如宋末有鄭所南（思肖）「心史」，明末有「揚州十日記」「風倒梧桐記」等，曾激發民族意識，是世所共認的。

六四 學術史

學術史是四庫史部中所沒有的類名，但著作中除「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可作學術史讀外，仍不缺乏完整有體系的學術史。清初黃梨洲（宗羲）所著的「明儒學案」是最初的一部良好學術史，就明代各學派源流、代表人物及其學說內容，作一有系統的敘述，對於王（陽明）學各派，尤其說得精彩，如姚江、江右王門、泰州、東林、叢山等案都是。梨洲對於各家的不同或相反意見，都能用客觀的態度來敘述。這部書寫成以後，黃氏又寫「宋元學案」，未完成而逝世，經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宋元學案的編制方法更進步，每一學案之前，先列一個表，詳細說明那一派的師友弟子的關係，其次就是各代表人物的小傳，再次就是學術精義的摘要敘述。不過這書末了所附「王安石新學略」不大好。因為編者含有門戶見，不能客觀地敘述。清朝為學術發達時期，前半期的學術史，有江藩所著「清朝漢學師承記」及「清朝宋學淵源記」兩書，至於全期學術史則

梁啓超及今人錢穆各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編著，梁氏還有一種「清代學術概論」，內容比較簡單。錢氏頗贊揚宋學，對宋學一派敘述特詳，梁氏的敘述比較完全，因為他很欽仰漢學家的考證工作，對今文派尤其說得有聲有色，因為他自己出身於今文派。

六五 史評

過去所謂史評，包括三種著作：（一）如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評論作史方法的，可說是史學方法論；（二）如王船山的「宋論」，「讀通鑑論」，是評論史事的，就是借史事的討論來表現他對於時事的意見，這可說是史論；（三）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甌北）的「廿二史劄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等書，以考證史書記載的異同，論述各時代史實的特徵為主要內容，這種可說是史的考證學。

史論雖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那些評論對象的內容，但這一點無關重要，還不

如把它當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資料。史的考證學對於史實的了解及史書的閱讀都給予了實際的幫助，是我們讀史的重要參考書。至於史學方法論著作，是關於史本身的討論，是我國固有的科學之一部門，而且是社會科學裏面的一個重要部門，雖然還沒有多大的發展，那僅有的幾冊書也值得閱讀。

劉知幾是唐朝的史官，根據他的專門研究及工作經驗，著「史通」一書，詳論作史方法，分內外篇四十餘篇，有獨到的見解與銳利的批評。內篇開始的兩篇，「六家」及「二體」，分析唐以前史書有六種體例，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而其中只左傳及漢書兩體才可以爲作史的標準。他所說的六家，正代表着記言、記事，編年，國別，通古紀傳，斷代紀傳的六體。他所選擇的就是編年與斷代紀傳兩體。春秋雖然也按年月次序，但內容太簡單，好像大事年表一樣，所以不能算做標準的編年體。史記漢書雖然同是紀傳，但史記是通史，對秦以前史實敘述又不甚詳明，同時他所根據的經、子、史的古書

，也多流傳於世，因此劉知幾認爲它不完備，欠條理，且和別的书重複，不如斷代爲史的漢書好。劉知幾提倡斷代史而攻擊通史，自現代史家看來，是顯然錯誤的，但歷朝官修史書，自以斷代爲最方便，因爲它能夠寫得詳細完備而不至於重複，這或者是劉氏從史官立場而得出的結論。劉知幾又主張記載事實的真相，不大贊同因褒貶而歪曲事實的春秋筆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對論語孟子及諸子書，都認爲有些不可靠。

章學誠（實齋）曾過着遊幕生活，曾修過地方志，他所著的「文史通義」分內外篇，內篇兼論文史及一般學術，外篇專論方志。他的論史有幾個要點：（一）六經皆史；（二）史家分記注與撰述兩種，記注是搜集並保存史料的，撰述則是史書的著作；（三）通史一體，足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如史記及鄭樵通志等是（清修四庫金書，將鄭志入別史，未列通史一門，殊不了解通史的重要性）；（四）史學須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編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國史書自「春秋」起，就有拿垂訓借鑑爲宗旨的一派，朱熹著「通鑑綱目」，於三國時一定要把劉備做正統，就是這種道理。但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王鳴盛等都主張照事直書，不必強加褒貶，這可說是科學的史法。

六六 地理

我國地理學書，一般人都以「禹貢」爲第一部古典著作（清胡渭著有「禹貢錙指」，是研究「禹貢」的權威著作）。漢以後正史中有地理志。至以專書行世者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水經」或係一種古書），唐人「元和郡縣志」等，都不甚佳。宋時地理學較有進步，有「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等書及「南北對鏡圖」「混一圖」等地圖。西洋地理學於明代輸入，有利瑪竇、艾儒略諸人著作。清康熙年間，又派西洋教士測繪「皇輿全覽圖」，十年而成。但清末西學輸入以前，我國地理學範圍甚小，幾乎全是沿革地理，僅足備讀史的參考。章太炎曾在「國學概論」講演中說過：「地理本應包括地質、地文

及地誌三方面，但我國過去只有地誌。自然地誌僅清乾隆時『水道提綱』較好，政治地誌則以明末清初顧祖禹所著之『讀史方輿記要』（此書很著名，論軍事形勢極好）『大清一統志』『乾隆府廳州縣誌』『李申耆五種』較佳。『元史』地名複雜，須看『元史譯文證補』。南北史地名亦難清楚，洪亮吉、吳增僅、楊惺吾有該時期地誌或疆域圖之著作。

六七 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是國學中所沒有的名詞，但從今人眼光去看，我國過去已有體系完整的歷史哲學。漢朝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就是歷史哲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極經世」。董仲舒是用陰陽五行之說來解釋整個宇宙的，他把陰陽五行的理論應用到歷史的變化上，就創立了三統循環的學說。這就是說，世運有黑統、白統、赤統，循環交遞，周而復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統的象徵，繼周的統治者又當為黑統。歷代帝王創建新朝，必須

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變，這和三統論有關聯。邵雍的「皇極經世」，說天地之終始爲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這樣算起來，一元就是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終，天地壞滅，此後即另有新天地，照此公式，重新開闢。他這種推算，和六十四卦配合，其實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的數目類推出來的。他又說現在之世界，雖距天地之終尚遠，但最好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之世界，正如方已盛開之花，雖蕊瓣層層，而衰機已現，因爲他認定堯舜時代是黃金時代，此後便一代不如一代了。

過去我國人大都相信這種退化觀或循環觀的歷史哲學，但清末康有爲根據公羊傳春秋三世之說而倡進化觀，說世界由據亂世進到升平世，再進到太平世，「孔子生當據亂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歐美大變，蓋進到升平之世矣，異日大地大小遠近如一，國土既盡，種類不分，風化齊同，則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預知

之」。(康著「論語」注)。

康氏的進化觀雖然高明一點，但其玄想神祕，也和董仲舒邵雍差不多。

六八 新史學的產生

新史學受外來影響而發生，對傳說的歷史觀念有重要的改變。這可以拿梁啟超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做代表。新史家認為(1)過去史書是寫給帝王或貴族等少數人看的，現在則應以全民為讀者對象；(2)過去史書是為死人作的，如帝王紀傳，私家墓志家傳等都是頌揚死人功德，現在則應為生人而作；(3)過去垂訓的史法，使紀錄失真，現在應以客觀記述為主；(4)史的範圍應以收縮為擴張，過去史外無學，什麼天文呀，曆法呀，官制呀，典禮呀，刑法呀……通通包括在史書裏面，後來分途發展，那些部門已成了獨立學科，歷史範圍自應縮小，例如「廿四史」中的「天文志」，從「漢書」一直到「明史」，老是記載那些星座躔度，其實這都是天文學範圍的事，史書不應容納的，史書所應記載的是

我國的天文學史，如何時發現中星，何時發明置閏，何時發明歲差，以及關於恆星行星的辨別，蓋天渾天的爭論等，這就是天文史，是史書所應記載的。這樣，一方面歷史書既把各科學術還給那些學術本身，另一方面却須把每種學術以及我民族一切文化業績的發展過程，分門別類地講出來，所以是收縮也是擴張。(5) 他們還覺得過去史書，無論是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都不免是片斷的記載，或缺乏縱的聯繫，或缺乏橫的聯繫，我們現在則須注意緊密聯繫的著述；(6) 過去史家缺乏進步觀念，我們現在作史，則須有此觀念；(7) 過去偏重人名地名的記載，偏重政治或驚人事變，現在則須注重一般的敘述。

梁氏書還有補編，專敘人物傳記及文物專史的作法。梁著的缺點在於他還沒有認清歷史變化的客觀規律，有時偏向於英雄造時勢的觀點，且有過分重視政治作用之處，其於垂訓借鑑的舊套，也未能完全免除。但梁氏治史方法確是科學的，他這部著作是新史學的開路者。此外，蔡尚思的「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中

華出版）頗能提出更新的觀點。

六九 新史學的業績

新史學的工作有三方面可說：一是史料方面，過去帝王起居注一類的無意義史料，已經刪除，另外却發見許多新的史料，例如（1）殷虛甲骨文及古器物的發掘，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等都有研究報告，如王之「殷虛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足證「世本」及「史記」的殷商帝系為實錄，又王氏的「殷商制度論」也很重要。（參看第三節）（2）西域考古的種種發現，羅振玉曾根據它編成「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古續編」。（3）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此物首先是羅振玉氏在北平市肆中發現，正有一批檔案已作廢紙出賣，將運往造紙工場去作原料，羅氏出重價收買之，編「史料叢刊」十冊。另一批未賣掉的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整理，曾編成「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冊。（4）各民族文字的發現，中國史上若干民

族的語文，現在已不可通曉，如遼、金、西夏文字，近年從北方各處石刻及地下發掘，逐漸發現，而且在西北各地發見了佉盧文、回鶻文、粟特（康居）文等。西南邊疆民族文字，有丁文江氏「彝文考釋」一書。（5）吉金文字的研究，見前第二八節。（6）無文字史料的採獲，即各地發掘的銅器陶器石器等等。

一是研究工具方面，比過去擴大加多，如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解剖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等科學，都能幫助我們鑑別種種史料。某次一德國地質學家在北平見市上有賣龍骨治病的，他買來研究，發見似乎是第三紀人類的化石，可見隨處都是史料。

一是著作方面，綜合性質的有新通史的編著，章太炎曾擬通史略例而未寫，現有鄧之誠、章嶽、呂思勉、周谷城諸氏先後發表的著作，分析性質的有學術史，文化史，經濟史，政治思想史，音樂史，美術史，文學史，哲學史等等的專史產生，商務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包括專史至四十餘種，而社會發展史的問題

，尤其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和討論。

在五四運動以後不久，以疑古精神爲中心的國故整理，對於中國古代史會盡了一種開闢道路的職任。過去一般好古崇古的學者，無論是理學家或考證學家，都相信古書上三皇五帝堯舜的故事爲完全真實，因爲他們不敢懷疑經典，自顧顧剛氏「古史辨」的皇皇大著出版，許多迷信古書的人爲之震驚。比方說「禹是蟲」之類，這是過去考證家所不敢說的。這些疑古的學者，認爲那些可作古代史料看的六經也不可靠，如尙書梅賾偽古文固不用說，卽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也沒有信史的價值，至於易經乃是一部卜筮之書，更不能作上古史料看，因此對於唐虞夏商的歷史，只好存而不論，要作史只可從春秋時代起。這種存疑的態度爲另一派新史學家所不滿，於是他們又開始運用科學的方法來進行中國原始社會史的研究。最初的一部著作就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利用「詩經」，「書經」，「易經」中的史料，又根據敵國銅器銘文及殷虛甲骨文字的考證，旁採

「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書裏面的神話，而加以合理的解釋，使那些荒誕不經的傳說，都成爲古代歷史事實的說明。過去周秦諸子以至司馬遷一直到清代樸學大師們都不會理解三皇五帝時代的歷史，因爲他們都是用後世封建國家的制度去想像古代，而把古代傳說描寫成爲帝王的故事，現在新史家根據社會由野蠻進文明的發展法則去分析那些傳說，便知古代沒有帝王，只是共財同居的部落的酋長。繼郭氏而發表古史研究文字的是呂振羽，他應用舊石器、新石器時代的出土古物，配合着民俗學的知識，而同古書上的神話傳說相印證，寫出一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最近又有一部「中國原始社會史出版）。郭呂兩氏的意見雖然還不足爲定論，但比之僅僅存疑的學者們是進了一大步，是表現了更深刻的見解。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時期區分，各史家還沒有統一的意見，如郭沫若把殷商看做氏族社會，西周看做奴隸社會，春秋以後看做封建社會，但呂振羽則認爲殷商是奴隸社會，西周以後爲封建社會，這是比較合理的兩派，還有種種離奇的意

見，茲不贅述。

總之，這些新史家的觀點，與主張「六經皆史」的章實齋章太炎諸氏以及懷疑古史不可靠的胡適之顧頡剛諸氏，都有所不同，章氏過於相信古書，胡顧則過於排斥神話傳說，但郭呂諸氏能以另一種眼光來觀察那些荒誕的神話與不可靠的傳說（參看第三四節）。他們的古書新讀法，是從來一般國學專家所不曾發見的。

第七章 諸子

七〇 諸子的學術派別

古時尊稱男子爲「子」，各派學術著作也多稱「子」，如「孟子」「莊子」等，大概這種著作，多半是由門弟子記述其師說，編輯而成，書中常常說及其師而尊稱之爲子，後人便拿這個人名的「子」來作爲書名了。劉歆班固的羣書分類中，有諸子略一類，包含九流十家（見第四〇節），大部分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著作。稱爲九流的九家是各有它的理論體系的，在九流之外的小說則沒有什麼特殊的理論，而只是九流中作通俗化運動的或民間討論學術的零星著作。例如「虞初周說」九四三篇，據應劭的解釋：「其書以『周書』爲本」，「周書」是一種史書，現存有「汲冢」發現的本子，「虞初周說」大概就是集合民間傳說寫成的一部「周書演

義」。又如「宋子」一書，是宋輕所作，宋輕的爲人，「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捨者也」（莊子天下篇），他極力陳說見侮之並不足爲辱，以消滅人們的爭鬪心，並到處宣傳反戰，理論與行動是近於墨子，而宣傳方式則是通俗的，大概採取了許多民間故事做材料。「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小說家書，沒有一部流傳後世的，我們以後不再討論它了。其餘九家著作，多少還有一些存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儒、道、墨、名、法、五家後面將要分別說明，因爲這幾家都有特殊的哲學思想。至於雜家著作，最重要的是「呂氏春秋」及「淮南子」，是集合幾派學者編寫的，所包含的思想不止一種，但我們從這種書可以得到各派思想的補充說明。陰陽家的著作已經失傳，但他們的理論在旁的書上有零星的敘述，尤其是「術數」（關於自然現象的占驗以及卜筮）「方技」（醫藥）二「略」的書，及一部分「兵家」書，沒有不是根據陰陽家的理論的，例如「黃帝內經」一書，是醫家假託黃帝名義而寫成的病

理學，就是陰陽家學說的具體應用。陰陽家學說包含哲學上的宇宙論，及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的理論，又發展為解釋社會現象的歷史哲學。就是儒家也受了陰陽家的影響，儒家在孔子時，本來不談宇宙，也沒有天人合一的理論體系，到戰國時候，採取陰陽家的學說，方才大談其宇宙，而有「易經」之作（採郭沫若氏的臆說），就是子思孟子的發揚五行舊說（據「荀子」說），也未必不和陰陽家有相互的影響，到漢朝的儒家董仲舒以及著作讖緯之書的先生們，更充分地採取陰陽家的學說了。縱橫家是春秋戰國時代在國際間活動的策士和外交家，他們講求縱橫捭闔的手段和辯論說服煽動的言語技術，最著名的人物是蘇秦、張儀，而孔子弟子子貢也相當著名（「史記」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孔子也是倡縱橫之術的，他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他的教育科目中有「言語」一科，高材生為宰我、子貢）。現在流傳的著作有「鬼谷子」一種，據說是蘇秦所作。但這

書還不如「戰國策」的足以代表縱橫家。農家列於九流之一，不止是講求農業技術，他們也有理論，在經濟上主張重農，在政治上主張打破勞力勞心的界限，廢除統治被治的分別，孟子所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倡導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的理想，反對「厲民而以白養」，這人卽屬於農家，其學說是從道家發展出來的。

七一 儒家

儒家的開派大師是孔子，孔子的思想，可以「論語」代表之。孔子思想的特徵是（1）不信神怪，不談宇宙本體，專講人事；（2）因此在政治上就拋棄了上古的天道思想，而主張人治主義；（3）以倫理思想爲中心，他的政治主張及邏輯方法都從他的倫理思想引申出來；（4）對當時的現狀主張改革，但改革方法却是和平的，折衷主義的。孔子的倫理思想，是主張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而以「仁」爲根本觀念。仁是愛人、救世的熱情，而出發點則在於孝悌，這就是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推愛父母兄弟之

心以愛一切世人。實行的方法則有所謂「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積極方面，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以爲這樣推己及人的仁愛，可以使五種人倫關係調整合理，而社會便能安寧發展。同時在政治上能夠推己及人，卽由親親而仁民，便能施行仁政，以德化民。孔子主張「以禮讓爲國」，凡在統治地位的一定要有道德，和希臘柏拉圖以哲學家治國的理想相像。孔子推己及人的倫理道德學說，應用於邏輯上，便成了「問一以知十」「舉一隅則以三隅反」的演繹法。同時孔子也應用歸納法，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卽注重觀察事實，爲應用歸納法的一例。

發揚孔子學說的有兩派：一派是子思和孟子，一派是荀子。據郭沫若及王柏兩氏考證，「易傳」（十翼）「大學」和「中庸」一樣，都是子思的思想。子思哲學是觀念論的，他發展了孔子的演繹邏輯，而以主觀範疇的「誠」爲宇宙本體，建立了天道與人性合一的體系。在政治上以正心誠意爲基本，構成修齊治平的

一列程序。其在「易傳」上，提出「陰陽不測之謂神」，在「中庸」上盛稱「鬼神之爲德，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又贊美孔子爲天下至聖，可以配天，這幾處文字，頗有宗教化色彩，或係受了墨家的影響。孟子繼承子思的思想，與楊朱墨翟兩派作理論爭辯，其言論見於「孟子」七篇。孟子倡性善說，認爲仁義禮智，是人類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只要擴充這個良知良能，「人皆可以爲堯舜」，因此又主張「存心」「養性」的修養方法。孟子與子思一樣，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又自命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統繼承者。他表面上不講功利，而標榜仁義，其實是以仁義爲功利，如說「仁者無敵於天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能一之即能統一天下）等話，處處都說出仁義的實效。孟子這種政治主張就是所謂王道，王道是開明專制，故尊重民意，強調「民貴君輕」之說，王道又是保育政治，故說「保民而王」。對於人民生計，他主張實現井田制的理想，「薄稅斂，深耕易耨」，使人民有「恆產」。以「野人」養「君

子」。

荀子名況，又稱孫卿子，趙人，他的學說與子思孟子不同，可說是發展了孔子的經驗論一方面。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須用人為的方法教育訓練，方才可以為善。因此他很注重禮樂，注重教育，荀子書中的「禮論」「樂論」「勸學」諸篇，為大小戴「禮記」所採用，可以證明他在儒家中地位的重要，但自宋儒尊孟黜荀以來，一般人都研究荀子，儒家思想更狹隘了。荀子的無神思想，比孔子更進一步，他在「天論」篇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又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這即是主張利用自然、征服自然，頗有科學精神。荀子的「正名」篇，以實（存在）為名（概念）的主導，尤其是比較進步的邏輯，他憑藉這個工具和「別墨」及詭辯家作鬪爭。荀子書以王先謙「荀子集解」本為佳。

道家的主要人物是老子，著作有「道德經」五千言，據考證，這書是戰國時環淵所編，環淵又叫關尹子，也是道家的要角。我們從「道德經」研究老子思想，便知老子認定宇宙的本體，是「道」或「天」，是自然的物質，又指出「反（矛盾）者道之動」，而運動過程則有幾個階段，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指出對待事物的相互轉變，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等。又因強弱剛柔動靜可以轉變，所以主張以弱勝強，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他對於社會的評判，則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又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他談到治事方法主張「無為」，即認為人類作事必須遵守自然的規律，不可違犯自然規律，任意妄為，所以又說「無為而無不為」。老子這些思想都很客觀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主張靜止，主張無中生有，主張復古，主張無知無欲，主張柔弱、不爭，因而形成消極退讓的人生觀，他這種逃避現實的幻想，却是觀念論的。老子書，王弼注本及魏源

「老子本義」本較好。揚樹達輯諸子論老子的話而成「老子古義」一書，是最好的參考書。

繼承老子哲學的有關尹、列禦寇、楊朱、莊周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楊朱貴己」（呂氏春秋不二篇）。關尹的學說只從「莊子天下篇」可以知道一點，他是認定人類的認識，必須如水或鏡一樣，採取純客觀主義的態度。列子與楊朱的學說，現在都只能從晉朝人編撰的偽「列子」書中去尋找。列子明白指出天地之初爲一渾淪的實體——「太易」，太易變化而生萬物，完全是機械的運動，是有必然性的，又提倡無欲無我的客觀主義，即「貴虛」。楊朱否認人死後還有靈魂存在，是一個無神論者，他認爲「道」是活動的自然力，表現在人類中，就是嗜好情欲等，他主張「全性保真」，滿足人類自然的欲望，是近乎希臘伊壁鳩魯的快樂主義者。孟子曾指斥他的「爲我」主義。說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但他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

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荀子及韓非子都有評判楊朱的話，可參看。

莊子與老子並稱，而思想不相同。兩子都尊重自然力，這是道家的根本思想，但老子尊重自然，是主張隨順自然之理以治事，其對於治國主無爲而治，對於抗敵，主先以弱自處，都是入世的態度，所謂以無爲有，以退爲進也，莊子就不是這樣，他因尊重自然力而主張委心任運，頗有出世思想，是將老子的消極一面特別發展了。莊子不能將有和無統一起來。因此把現象和本體也隔開了。他認爲現象世界所謂大小貴賤壽夭等等的範疇，都因比較而生，即相對的，實際上是沒有的。現象世界成爲虛幻，那麼我所應把握的就是那個無差別的「道樞」了。這樣，莊子的世界觀就成了唯心論的，它和佛教大乘所謂「空」的原理相似。所以章氏太炎曾用佛學理論來解「莊子」，作「齊物論釋」。章氏又說：莊子的根本主張是自由平等。他以爲「逍遙游」篇是講自由，真自由是「無待」，即超脫世俗對待比較的觀念；「齊物論」篇是講平等，真平等是我與物平，去是非的差

別，化彼此的界限。莊子書說理很精，所以章氏非常推重。全書三十三篇，末篇（天下篇）評論各派學術，可考見古代學術源流。王先謙「莊子集解」，郭慶藩「莊子集釋」，都好讀，郭書載晉郭象注更全備，郭象本身也是一思想家，他作的注可作晉人哲學讀。（「齊物論」一篇，傅斯年氏認為係慎到所作。）

七三 墨家

墨家是春秋戰國之間下層民衆與商人中間的一個幫派，帶宗教性，其領袖稱爲鉅子，鉅子對其徒衆，可以執行嚴格的紀律。墨學開派大師是墨翟，現在的著作只「墨子」一書，編著者是墨氏門徒，且不出一人之手，其中最重要的是「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非儒」等篇，因其敘述墨學中心思想。墨子站在新興商人及大眾的立場，所以主張短喪節葬，反對奢侈娛樂的貴族生活，反對那種容忍不良現狀的命運觀念，反對侵略性的戰爭，主張打破家族觀念而博愛人類，主張選用賢能而廢除

世襲貴族的統治，主張集中意志（尙同）而造成和平的大一統。這些主張多半與儒家的主張不合，所以反對儒家。因爲原始的大衆組織多帶宗教性，所以說「天」和「鬼」（卽祖先的靈魂）都是有意志的。墨子之徒，刻苦耐勞，熱心救世，團結堅強，曾因反侵略而參加抗戰，對於軍事，兵工的專門之學，也極有研究。墨子書中「備城門」等篇，都是談軍事的。墨學的消沉，比道家名家等更早，大概是因爲它偏於實用而缺乏形式工夫（如禮樂），卽荀子所謂「蔽於用而不知文」的緣故，其實墨子「尙同」之說，卽主張思想定於一尊，也很足以供後世帝王利用。又墨家因爲沒有「天堂」「來世」的想像，也不能形成一種長期存在的宗教。墨子書文字通俗，但因時代過古，又失了傳授，所以不容易了解。清畢沅有校本，孫詒讓「墨子閒詁」，則集清代治墨學者的大成。

七四 別墨及名家

墨子書中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編

，是墨家中一派所謂「別墨」者的著作，其中包括有論理學（名學），數學及旁的科學知識，通常稱爲墨經，梁啟超著有「墨經校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裏面也有若干說明。「別墨」是墨家中專門研究名學的，我們不妨和惠施、公孫龍等名家者流一例看待。

論理學是各種學術的工具，所以周秦諸子都講正名之學。儒家的荀子精於名學，前已說過。墨家除「墨經」所講的以外，還有「三表法」，是他們的論證方法。又，「漢志」列在名家中的「鄧析子」及「尹文子」，其實是法家而兼名家。純粹講邏輯學的名家，應推惠施與公孫龍。惠施的書已經失傳，他的學說只能從「莊子天下篇」看到一點。「公孫龍子」漢志載有十四篇，現只存六篇，爲僅存的名家有系統著作。公孫龍以白馬論著名，他的推論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他還有「堅白論」，把堅、白的屬性從石頭的自體完全分離開來。戰國時名家有「合同異」及「雌堅白」

兩派。公孫龍屬於後一派，惠施屬於前一派。惠施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又說：「南方無窮而有窮」。又說：「今日適越而昔來」。章太炎氏認為，是說一切空間或時間的區別都非實有。他又說：「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章氏認為，這是說一切同異都非實有。別墨派也談堅白同異之說，而主張「合堅白」，「離同異」，與公孫龍惠施相反。當時名家具有辯證法的觀點，如「莊子天下篇」所謂「南方有窮而無窮」及「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命題，「墨經」上也有，都是說明有限與無限的矛盾的。

七五 法家

法治主義起源於春秋時代，如管仲子產所實行的就是，但形成一個學派却在尹文、申不害、商鞅、韓非的時代。他們所根據的哲學是道家的自然主義，因為自然界有一定的規律，人類行為也應有一定的規律，這種規律就是體現自然法而

創制的人爲法。他們以爲有了法，便使人們的行動有客觀的標準可以遵循，統治者以法馭衆，不必多費心思，大可以無爲而治。這也符合道家的旨趣。所以「韓非子」有「解老」「喻老」等篇，講老子哲學。「管子」因有一部分講道家哲學，「漢志」把它列在道家。同時他們和儒家墨家也有淵源的關係。儒家的禮治，據荀子解釋，是給人們欲望以統制，也就是把物質分配，按照智愚能不能的區別分級規定，這和法治已很接近。荀子又主張中央集權，主張「法後王」（即以目前政制爲基礎），這些理論都是法家所採取的。墨家主張中央集權，主張思想上同於天子，也是法家所採取的。法家有「術治」「勢治」「法治」等派，而以法治派爲正統。申不害主術治，術治是人君用權術來駕馭臣下，術是不公開的。慎到主勢治，勢治是用威權來統治，勢是自然演成的，不是人類意志所能任意創造。商鞅、韓非主法治，法是公開的，可由人的意志創造的。但我們也可說法家是法術並用，法是官吏治民的工具，而術是人君馭下的工具，即統御官吏的方法。

法家是反對人治主義的，儒家的以德化民，墨家的尚賢，都是法家所不贊同的。法家以爲人治是主觀的，不如法治的客觀無私。人治以得賢人爲條件，但賢君賢相只偶然的出現，不如法治的有常度。人治使君主煩勞，不如法治的無爲而治。法家論國家的起源，比墨家儒家正確，儒家主家族起源說，墨家主民約說，法家則主權力起源說。法家說「令尊於君」，是強調法的尊嚴性。法家雖然主張中央集權，但不主張專制，因爲他們認爲君主也要守法。可是他們有一個大漏洞，就是主張立法仍然操之於君主，君主既可立法，也可廢法，自然可以任意胡爲。所以荀子批評他們「民不議法」說的毛病，而提出「纂論（卽繼續的議論）公察則民不疑」的論點。法家書以「韓非子」爲最精粹，王先謙「韓非子集解」本可讀。其次是「管子」，清洪頤煊「管子義證」，戴望「管子校正」，章炳麟「管子餘義」以及今人「管子今詮」諸本，同時參閱最好。此外有「商君書」「尹文子」「慎子」等，不及管韓二子的重要。法家對後世政治頗有影響，漢朝的蕭

何、曹參、賈誼、鼂錯，三國的諸葛亮，都是服膺法家的。

七六 兵家及其他

兵家「漢志」不列於諸子，後世目錄學家則列爲諸子之一。兵家古籍流傳到現在的有「吳子」「孫子」「尉繚子」等數種，以「孫子」爲最重要。孫子爲吳王闔閭的大將，著「兵法」八十二篇，魏武帝選輯其中最精粹的十三篇，加以注解，名「孫武子」，後人陸續注釋的很多，通行本有「孫子十家注」。這書講論戰爭原理及戰略問題，有很精到的見解，即在現代，依然適用。又，漢以後儒家書，其不是注解儒經而能自成一家言的，向來也被認爲諸子。如桓寬「鹽鐵論」，係根據漢時因鹽鐵業國營問題而起的辯論，擴充寫成的，可以作爲經濟史的資料，張敦仁攷證及王先謙校本都好。如賈誼「新書」，劉向的「新序」、說苑「及」列女傳」，陸賈的「新語」，揚雄的「太玄經」，「法言」，隋王通的一文中子」等，則很少新見解。其中只揚雄頗足以注意，因其時陰陽家讖緯之學盛

行，他能給以有系統的駁斥使儒家學說與陰陽家分離，而與道家結合，開魏晉玄學之路。揚雄所根據的是「易經」與「老子」的自然主義宇宙觀與人生觀，並無新意。他寫「太玄經」，仿效「易經」體例；寫「法言」則仿效「論語」。他論人性，與孟荀兩家不同，他在「法言」裏說：「人之生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外儒家諸子，還有「孔叢子」及「孔子家語」，都是魏王肅所造，而假託周秦時代的著作。道家書有晉朝的「抱朴子」，葛洪所撰，頗足注意。這書分內篇外篇。內篇論神仙修煉，符籙劾治諸事，雖號稱道家言，其實和老莊沒有關係。外篇則論時政的得失，人事的好壞，大意是以黃老爲主。所謂黃老之學，是漢時盛行的名詞，文帝景帝時代，賈誼晁錯等都是兼講黃老之學的，這是根據老子的議論，而同時假託黃帝之說的，例如陸賈「新語」中有「無爲」篇，批評秦代法令繁苛、刑罰酷虐的缺點，主張行寬大政策。這樣看來，黃老之學，仍然是道家言，到了神仙修煉，就不是本來的道家言而是道家的變

變種了。雜家書前曾說過「呂氏春秋」（畢沅校本好）及「淮南子」（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可看）二種，東漢初年大哲學家王充所著的「論衡」，後人也將它列入雜家，這部書非常重要，下節另加說明。

七七 王充之學

王充哲學屬於道家一派，他的「論衡」一書，即根據道家自然主義的觀點，來批評當時一般人的迷信。他駁斥陰陽家天人感應、災異示警的學說，認為人死後沒有靈魂，禍福是人自己所造成，不是鬼神主使的。他對於歷史的見解，是今優於古的進化觀，反對一般人貴古賤今的觀念。王充的方法論頗符合科學，他立論必根據事實、證據，再以心意詮訂之，是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統一。他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有善有惡，但可隨環境而變遷，所以要注重教育。他在「非韓」篇非難韓非，在「問孔」及「刺孟」篇，說明孔子孟子的學說裏也有矛盾，在「說天」及「說日」篇，非難騶衍及天文家的學說。他對於「論語」裏面孔子教子貢去

「食」存「信」一點，提出反對的意見道：「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有成？……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自孔子成爲偶像以來，數千年來，沒有人敢公開批駁孔子的議論，只除了王充和明朝的李卓吾兩人。李卓吾的書曾被人焚燒，王充的書幸獲保存，這又可見漢朝雖尊崇六經爲官學，民間的學術思想仍然自由，宋明以來，儒家的思想專制，方才變本加厲。清朝研究諸子的風氣漸開，乃在參證經義的大題目下進行的，並不敢闢揚諸家絕學，與儒家分庭抗禮。因此王充之學，特別值得注意。「論衡說日篇」說：「日之長短，不以陰陽，……夏日日在東井，冬日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又說：「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這又可見王充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與嚴格的科學精神，與充滿術數觀念的陰陽家及今文派儒家比較，真不知進步了多少！可是王充也有一個大缺點，

就是認爲個人的貴賤禍福，國家的盛衰治亂，都由命中預定，人力不能改變它。這仍受受了時代的制限，免不了世俗之見。

七八 魏晉時代的玄學

三國六朝時代，儒家經學衰微，拘牽文字，不講大義，道家思想於是佔了支配地位。當時的稱道家之學爲玄學，稱「老子」、「莊子」、「周易」爲三玄。「周易」(即「易經」)雖是儒家經典，但經老莊派學者的注解，也道家化了。當時注解老莊的極多，差不多可以和儒家經傳的注疏相頡頏。其中以何晏王弼爲代表，何晏的著作爲「老子道德論」及「論語集解」，王弼的著作爲「易注」及「老子注」。此外郭象的「莊子注」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何晏王弼等的思想是繼承莊子而不是繼承老子的，以虛無寂滅，超脫現實爲主。在此等思想響下，產生了阮籍、嵇康、劉伶等的「清談派」。阮籍著「達莊論」，闡明「萬物一體」的學說，又作「大人先生傳」，攻擊「君子之禮法」。嵇康作「釋私論」，指明

「君子不以是非爲念，但虛心率性而行，自然不違道」。劉伶作「酒德頌」，表現一種放蕩不羈的人生觀。當時有人僞託列禦寇所作的「列子」，內有「楊朱篇」，也是說，只有快樂享受是人生之目的及意義所在（張湛作「列子注」，人們懷疑「列子」就是他編撰的）。此等哲學思想，表面上是樂觀的，實際上是悲觀厭世，消極，頹廢。由清談派再發展下去，便成葛洪一派的神仙修煉之術（「抱朴子」），這是逃避現實的最後歸宿。就玄學時代的著作講，以郭象的「莊子注」爲最有價值，因其對於莊子的自然主義與神祕主義，都能充分發揮。郭象說無不能生有，天地萬物都是「塊然而自生」，卽所謂「獨化」之理。又說天地萬物，「彼我相與爲脣齒」，「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又說：「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這就是說，一件事的產生，乃整個客觀環境所造成，不是一二特殊人物所能獨創的。又說萬物彼我「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似

乎就是說明對立的統一。他又說：「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講到社會制度，則說「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講到人性，則說「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這些見解都很透澈。至於神祕主義，就是所謂「至人」或「聖人」人格的解釋，那就是忘彼我，統小大，齊死生，同是非，泯除一切差別的觀念，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所以章太炎氏說郭象承何晏「聖人無情」之說來解「莊子」，在他的筆下，「聖人竟是木頭一般」。

七九 子學之興起與消沉

中國學術菁華，全在周秦諸子，不但哲學思想，高深微妙，遠過於後世儒家（章太炎說宋明理學不如佛學的精微，但周秦諸子則包含了那樣精微的哲理。馮友蘭說理學是哲學之哲學，古代只有公孫龍子講求這種純理的學問。人們見解雖然像這樣的不一致，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說周秦是中國哲學思想最發達的時期），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也都在那時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學，名墨儒法各家